

## 目 录

### 长篇随笔

六个字母的解法（下）  
刘禾

### 诗歌选辑

你居然夹带了语言凶器（外四首）  
朱必圣

隐秘（外五首）  
叶辉

在路上想到的（外五首）  
曾宏

花家地的秋天（外五首）  
杜涯

引刀的人（外三首）  
于荣健

南山笔记十首  
游刃

腌脏的年轻人（外四首）  
鲁亢

荒凉的证人（外三首）  
沈苇

### 七十年代

与天下共醒的日子  
曲磊磊

后来与过去  
田浩江

我这十年忙得挺好  
郝惠言

### 八方来鸿

罗伯-格里耶的文学态度  
陈力川

### 于坚作品选

于坚诗选

被勾引的罗兰·巴特  
——读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札记

## 六个字母的解法（下）

刘禾

40

终于盼来了春假，整整一周的闲暇。

闲暇不能闲，正好可以集中时间，把魏丁顿的生平弄清楚。

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很多书籍和旧杂志，一一摊开在地上，反复翻阅，做笔记。没过多久，魏丁顿这个人在我的头脑里就形成一个清晰的轮廓。不过，它只是个轮廓，里面需要填入一些色彩和起码的细节，才能饱满起来，于是，我又到处寻找那些与奈思毕特有关的细节。春假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了最后一天，我突然病倒，得了呼吸道感染，连日卧床不起，被迫在家中休息了几天。

养病的日子也闲不住，我把纳博科夫的小说《塞·纳特的人生真相》拿出来，断断续续又看了一遍。

通过多次的阅读，我总算体会到什么叫“纳博科夫式”的写作，它几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就好比一段变化丰富的音乐，中间嵌入了无数的变奏，主旋律是小说主人公纳特。纳特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往往分不清现实和梦幻之间的界限，对他来说，走进幻想或者回到现实，几乎就像进门出门那么容易。一旦进入幻觉，如此饱满逼真的细节——比如墙壁上的紫罗兰花，草坪上的长条凳——怎么会不是真的？纳特常常在自己的幻像中流连忘返，为那个世界里的一草一木感动不已，幸而他身边有些亲朋好友，个个现实感都比他强，不时地替他指点迷津，提醒他，现实的门朝哪一边开。

有一天，纳特怀著无限的幽思，来到法国南部的一个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叫洛克布林尼。他事先打听到，生母当年客死他乡之前，就住在这里的一个名叫紫罗兰的宾馆。纳特来到大门口，探头一看，里面有座小楼，小楼墙壁上画着俗气的紫罗兰花，院里空无一人，最后，他忐忑的目光落在草坪上的一把长条凳上，显然，这条木凳曾经涂染过一层蓝色的漆，现在早已褪色，带着岁月的沧桑，孤零零立在那里。纳特久久凝视着那个寓意深长的长条凳，尽力克制涌动的心潮，他想象母亲在世的时候，一定经常坐这里晒太阳，一边想，他一边蹑手蹑脚地走上草坪，在长条凳上坐下。

不知过了多久，扑咚……纳特的伤感倏然被一个声音打断，低头看，原来是一只金黄色的大柑子，它从膝盖上的纸袋子滚落出来，砸在他的脚上。这只柑子似乎对他是一个微妙的提示，但纳特浑然不觉。

回到伦敦后，有一天偶尔见到生母的表妹，顺便提起这事，纳特才觉悟到自己把地点弄错了，没错，母亲住在一个叫紫罗兰的宾馆，但不在洛克布林尼，母亲住过的紫罗兰宾馆是在法国南部的瓦尔……唉，多么荒唐的误解。

哪个读者能领会这样一只柑子的微妙提示？

纳博科夫笔下的梦游者老是这样，迷离于恍惚之间，惶惶不可终日。一个俗

不可耐的名字，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一件偶然发生的琐事，都能引起他太多的遐想，投入太多的情感，接下来，总是莫名其妙地失望。我猜想，即使纳特没有走错地方，即使他找到了法国南部瓦尔的紫罗兰宾馆，谁能保证他不会由于另一些误解或者意外，进错一个门，而走上新的歧途呢？

41

自从迷恋上 NESBIT 这六个字母以来，我像着了魔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脑子里构想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找到正确的解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我开始沉不住气，难道我最初的直觉根本不对？有时候，一种突如其来的坏心情袭来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像纳特一样，也被幻象引导，进错了门，一直在迷途里徘徊，却不自知。

每当这种疑问涌上心头，我就忐忑不安，质疑自己的出发点，奈思毕特的烟斗是不是真的值得追究？当然我也有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世上有多少疑云从未破解，而多少所谓的真相，一旦认真追究，还不依然是疑云重重？何况是人生的真相？就说纳博科夫自己，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的命运，就完全清楚吗？不过，现在我碰到的难题是难上加难，因为要解开六个字母之谜，我不能不进入纳博科夫的叙述迷宫，又不能不在他布下的各种陷阱里迂回行进；纳博科夫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亦虚亦实，真假难辨，一旦落入他的迷魂阵，想破阵突围，绝不容易。我甚至想，奈思毕特手里的烟斗，会不会也是作者刻意设下的陷阱之一？

所幸的是，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李约瑟图书馆档案员的回信打开了我的思路，我脑子里开始出现一连串有意义的关联：魏丁顿——奈斯毕特的烟斗——剑桥大学——社会主义。

顺藤摸瓜，几天后，我居然在大学图书馆找到几张魏丁顿生前的遗照。这些照片全都显示一个酷爱烟斗的英国绅士形象：瘦高挺拔，嘴角衔着一只烟斗，眼神犀利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好像准备随时发问。而且，这个人有一副宽阔的额头，大概年轻的时候就显出早秃迹象，这和我的想象比较吻合：人到中年的奈斯毕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有了剑桥生物学家魏丁顿的生平和照片，我一下子信心倍增，把那些烦人的疑虑全都抛在脑后，开始专心致志地投入新的研究。

魏丁顿手不离烟斗的形象已经确凿无疑，但是作为独立的证据，仅有照片不够，还必须发掘更确切和更翔实的文献资料，要不然，我怎么能证明魏丁顿和奈思毕特就是同一个人？问题是，当事人都已过世，有些关键的环节，早已消逝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永远无法复原，到哪里去寻找确切的证据呢？我担心这样寻找下去，可能永远没有结果，那么间接证据会不会有用呢？我思索再三，觉得下一步恐怕只能从寻找间接证据入手。以往的研究经验表明，蛛丝马迹常常是揭示真相的关键，我千万不能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

踌躇之中，我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奈思毕特，他身上都有一些什么显著的特点？

当年奈思毕特给纳博科夫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不仅是因为他的烟斗，或者是他的列宁主义，可能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奈思毕特与诗歌和文学的特殊因缘，这一点实在不该忽略，由此我想到另一个突破口。

42

我早就留心到，剑桥左翼科学家在知识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们有点像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贝尔纳、李约瑟、魏丁顿，这三个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但他们各自的文学艺术修养极其深厚，绝不是浅尝辄止或者随意涉猎。从他们的社会交往中也可可见一斑：这几位科学家与欧洲先锋派诗人和画家的往来频繁，有些艺术家成为他们的相当亲密的朋友。

有一天，毕加索来贝尔纳家做客，几轮鸡尾酒喝过，毕加索兴致大发，拿起一支油画棒，在主人客厅的墙壁上运笔如飞，顷刻间完成一幅“壁画”。这幅画至今还在，几年前被英国的一家医疗慈善机构所收藏。我查了一下，当年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有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那篇报道的标题是《价值 25 万英镑：毕加索的一幅涂鸦》，文章开篇如下：

毕加索当年在墙壁上信手为之的一幅涂鸦，已被我国最大的一家医疗慈善机构所收藏，成交 25 万英镑，此举不凡之处在于，它象征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之间的精神交融。1950 年 11 月毕加索在英格兰创作了这幅绝无仅有的“壁画”，那天他在一个朋友家中做客，这位朋友是英国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伯贝克学院的贝尔纳教授。

这个描述相当属实，魏丁顿当时也应该在场，并且亲眼看到毕加索的现场表演，尽管我无法证实这一点。我的依据是，魏丁顿既然是贝尔纳的好友，而且对毕加索和前卫艺术家的活动了如指掌，那种场合怎么能缺少他呢？况且毕加索去英国访问，目的是为了参加贝尔纳组织的世界和平运动大会，魏丁顿恰恰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的推测不是空穴来风，有一件事足以做证明：不久前，我在艺术史图书馆查资料，在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书名叫《表像之后》（*Behind Appearance*），把书抽出来一看，作者的名子让我的眼前一亮——魏丁顿！这书原来是他晚年的一本艺术史著作。在分工如此细密的现代世界，一个科学家竟然撰写了一部艺术史专著，这可以说闻所未闻。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艺术是魏丁顿的业余爱好，写这样一本书，不过是过把瘾。但看完书之后，我马上纠正了自己的偏见。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作，不但立论平稳，材料扎实，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作支持，而且洞见多出，大有和艺术史专家一分高下的架势。我奇怪，像魏丁顿这样重量级的科学家，整日忙于遗传学的实验，哪来的时间来从事现代艺术史的研究？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除非——我忽然又想——除非魏丁顿是奈思毕特，或者是类似奈思毕特的那种人。

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奈思毕特与纳博科夫站在壁炉前说话的场景。这两个朋友碰到一起，自然难免神聊，海阔天空，神游四方。讨论诗歌，固然是题中之义，其间也必定牵涉到当代艺术，因为纳博科夫和魏丁顿生活在欧洲前卫艺术家最活跃的时代——不难想象，魏丁顿对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观察和研究，一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至少从他当剑桥大学本科生的时代已经开始，否则无法解释这个科学家为什么对巴黎的画家和诗人——尤其是他们的底细——如此知根知底，好像他自己就生活其间。

坦白讲，我对欧洲的立体主义艺术一直心怀成见，每次去博物馆看现代绘画时，我都小心翼翼地绕开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立体主义作品，刻意地与他们保持距

离。不过，读了魏丁顿的艺术史，我才真正明白自己在躲避什么，这本书帮我打开了一个很大的心结。

一百年前的巴黎，蒙马特高地汇集了一批年轻、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们来自欧洲各国。虽然大家手头拮据，温饱艰难，但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无拘无束，让年轻人活得很开心。毕加索住在一幢外号叫做“洗衣船”的楼房里，房子自然破旧不堪，所以只要不在工作室里作画，他就总是和一帮艺术家朋友坐在咖啡馆或者小酒吧里聊天。这一天，蒙马特的狡兔酒吧来了一位名叫毛里斯·普林赛（Maurice Princet）的小伙子，毕加索热情洋溢地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普林赛和这些不修边幅的穷光蛋艺术家很不同。他总是一身绅士打扮，可是喜欢和穷苦潦倒的艺术家们一起混。他的新婚妻子爱丽丝当过毕加索的模特儿，不过，认识毕加索的艺术家朋友们没多久，这个爱丽丝就跟野兽派画家德兰跑了。毕加索的圈子，都很佩服普林赛，因为他懂数学，杜尚误以为他的职业是数学教授，其实，普林赛不过是巴黎一家保险公司的精算师，人很聪明，对数学也有钻研。有一段时间，普林赛几乎天天去找画家麦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和他们讨论非欧几何学与四维空间。

什么？非欧几何学？毕加索当然是半懂不懂，不过一下子记住了“四维空间”这个说法。普林赛对雅各布和毕加索说：欧几里德几何学见鬼去吧！古希腊数学早被超越了！现代数学——他指的是法国数学家昂利·庞加莱的相对论原理，因为庞加莱和爱因斯坦都是相对论的先驱——有一个重大突破，它正在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等等等等。毕加索听到这些消息无比兴奋，他不但把普林赛的话立马转述给阿波利奈尔，同时自己也立马着手在画布上做起“新时空”的实验。

现代数学的重大突破！啊，阿波利奈尔张着嘴，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究竟是一个什么突破？阿波利奈尔听得云里雾里，终究没有搞懂，但是和朋友毕加索一样，他记住了“四维空间”这个陌生的新词汇，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明。

普林赛加入艺术家圈子不久，阿波利奈尔把画家布拉克拉到毕加索的工作室，向他骄傲地展示毕加索刚刚完成的第一幅立体主义——尽管“立体主义”的命名当时还没发明出来——油画《亚威农的少女》。站在毕加索的新作面前，布拉克被震撼了，从这时起，他也投身于这场要让现代艺术根本转向的立体主义运动，开始了他在立体主义世界里与毕加索争奇斗艳的艺术生涯。

蒙马特高地咖啡馆多，酒吧多，谣言绯闻也多，现代数学自然也难以逃脱“被谣言”的命运。在这里，“四维空间”的数学思想首先被狡兔酒吧的艺术家发展成为奇谈怪论，然后被热心的阿波利奈尔拿去四处兜售——立体主义就这么诞生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7年的前后。魏丁顿的艺术史从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讲起，无异打开了理解巴黎先锋艺术的一个窗口。这个一贯喜欢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诗人，不但曾经替前卫诗歌鸣锣开道，而且还是立体主义的保护神——有人说，超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也是他的发明，这个我愿意相信，因为阿波利奈尔简直就是前卫艺术的缪斯、吹鼓手和新闻发布中心，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总而言之，说没有他，就没有巴黎的现代艺术，这倒也不全是夸张。

在我的总体印象中，诗人总是惜字如金的，但阿波利奈尔刚好相反，他写文章从不吝惜笔墨。一篇议论洋洋洒洒地写下来，天马行空，气势恢宏，一不小心

就发挥过度。比如在他的理解中，四维空间“代表无限宇宙的永恒化，是无穷大的维度，四维空间使物体获得可塑性，”这是他的原话。原文晦涩难懂，翻译过来更是不知所云。读了魏丁顿的艺术史，我才明白，倒不是我不懂，而是诗人肆意发挥，把这个概念弄得深奥难懂，就连数学家也弄不清他在说什么，所以魏丁顿干脆指出：那是 nonsense，“无稽之谈”。

我在读到魏丁顿的艺术史之前，对立体主义虽有成见，不过是跟着感觉走，相信自己的鉴赏趣味。但若细想自己在现代绘画方面的趣味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还是和毕加索有关，说不定就是毕加索帮我树立起来的，因为我最着迷的是毕加索的“蓝色时期”（1901-1904）的绘画，那些作品几乎件件是杰作，犹如黑人音乐的“蓝调”，让人魂萦梦绕，回味无穷；尤其在夜深人静之时，幽魂般的蓝色形象会无意中飘然而至，深深地搅动你内心深处的忧伤。

每次到博物馆看展览，只要一碰到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我就会长久伫足，心中萦绕着一个疑问：毕加索转向立体主义，是不是过早地告别了那个蓝色的幽灵？多么可惜啊，我一边为他惋惜，一边暗自责怪普林赛和阿波利奈尔惹是生非。

43

纽约有一点像北京，城市又脏又乱，但人气极旺，因之住愈久，人愈安。自从把家搬到曼哈顿岛以后，我和一些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倒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纽约，而是因为他们喜欢找到各种理由——无论听音乐会还是看展览——跑到纽约偷闲几天。其中一位朋友是经济史学家，很多年前我和她在一个研究所共事一年，后来成为朋友，无所不谈。

我的这个朋友是犹太人——先声明一下，我是有意不写“犹”，因为这个字，多半是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教士引入的译名，并且借此把欧洲的种族歧视和排犹主义植入了汉语。这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望文生义，误以为“犹太”是中国人发明的译名。其实，以元代文献记载来说，涉及到北宋时期最早来开封的犹太人，古人是把希伯来语的称谓音译为汉字“竹忽”或“朱乎得”，绝不是“犹太”。朱迪，是我这个犹太朋友的名字。她研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很多年，对海耶克理论的来龙去脉，作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是这方面公认的专家。2008年金融风暴发生后，华尔街那些官商勾结的内幕被频频曝光，犹如屏幕上一幕一幕的电视剧，但在朱迪眼里，这一切都不是新闻，因为她早就知根知底。像朱迪这样的犹太知识分子，我在美国学界和艺术界到处碰到，他们的特点是说话诙谐，喜欢自嘲，言谈中总带一点愤世嫉俗；只要你看过伍迪·艾伦自编自导的电影，你就会明白我这些话的意思，因为伍迪·艾伦是一个典型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

朱迪回纽约探亲，自然要见面。我陪她去 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看《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特展，中午在咖啡厅休息吃饭时，我忽然想起魏丁顿，忍不住向朱迪介绍起这位英国科学家对欧洲前卫艺术的研究，并且特别强调，是魏丁顿帮我解开了立体主义之谜。没料到，朱迪眉毛一扬，反问一句：

哪一个魏丁顿？

我一愣，她也知道一个叫魏丁顿的人吗？我把 Conrad Waddington 的英文字母给她拼读出来，然后又补充一句，朋友们称他“瓦德”。

朱迪听完摆一摆手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大名鼎鼎的魏丁顿，他是海耶克的敌人。

我将信将疑，难道这个魏丁顿是孙悟空，竟然也跑到经济学的领域大闹天宫？

不会吧？我们俩说的是同一个魏丁顿吗？我迟疑地问。

嘿，不就是那个剑桥帮吗？她笑着说，眉毛俏皮地往上一扬。

贝尔纳他们？我试探道。

对。

还有李约瑟？

当然。

原来朱迪对剑桥科学家的事迹一点也不陌生，她的博学再次让我刮目相看。临分手时，她嘱咐我，别忘了回头再看一遍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那本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里，海耶克指名道姓地骂过魏丁顿。

真有那么巧的事？我受到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回到家后立刻把《通往奴役之路》找出来读了一遍。果然，海耶克点名批评了以魏丁顿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科学家，并且把矛头直接对准魏丁顿早年写的一本书，叫做《科学的态度》。

海耶克为什么会把英国左翼科学家当作敌人？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里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因为，那些科学家主张“计划科学”——“计划”这两个字，是海耶克不能容忍的东西，并由此认定这些人是“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分子”，还说以魏丁顿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科学家“敌视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所代表的一切”。好大的帽子！魏丁顿，敌视现代西方文明？这个说法让我吃惊不小。

一个是经济学家，一个是生物学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怎会成为冤家对头？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一个故事所必需的情节和细节。

我早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无论什么人，只要和 20 世纪的剑桥学者有关，那就不能放过，都必须寻根究底——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线索，哪怕是草灰蛇线。

44

我开始搜寻相关文献和材料，研究了近两个星期，对其中原委有了不少了解。

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贝尔纳曾经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警告，人们对战后世界不能过于乐观，必须小心一种危险性：美国政府在战后打着捍卫西方文明的旗号，在全球推行改头换面的法西斯主义。问题是，贝尔纳并不孤独，同样作为声名显赫的世界知名科学家李约瑟和魏丁顿，也都说过类似的话，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这恐怕是海耶克不能容忍英国左翼科学家的真正原因。然而，在这种态度里，海耶克是不是误解了剑桥科学家的意思？如果批评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就等于敌视西方文明，那么批评中国政府是不是就等于敌视东方文明？这在逻辑上似乎说不通。

不过，思前想后，我对海耶克的境遇开始产生同情，因为他的思想和学说，在二战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并不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孤掌难鸣，处境艰难。如果设身处地着想，我若是海耶克，我多半也会生出这样的烦恼：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最具才华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一律左倾，不是变成奈思毕特，就是变成像奈思毕特那样的人？为什么最出色的诗人、作家、导演、艺术家和知识女性几乎都向左转，即使不加入共产党，也纷纷变成社会主义的信徒？

我又一次想到纳博科夫的尼卡表弟。

尼卡表弟与诗人里尔克在德国魏玛有过一次难忘的邂逅。可是，那次邂逅一点也不愉快，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谈不到一起，最后不欢而散。两人不愉快的原

因很简单，只不过是交谈中，里尔克试图在这个白俄贵族的后裔面前，为列宁的十月革命作辩护，不料这正戳到了贵族后裔尼卡表弟内心的创伤，那个伤口始终没有愈合。不过，这件事倒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海耶克年轻的时候所面对的红色知识界。

1922年初夏，尼卡和他的新女友兴冲冲地从柏林来到魏玛，探望他们的朋友——收藏家兼欧洲现代艺术的旗手——凯斯勒伯爵。热情的主人当时正好邀请了几位艺术家朋友到他的魏玛庄园小住，而诗人里尔克刚好在此养病，于是就有了作曲家和诗人相逢的机会。尼卡表弟当年在作曲上初显身手，被人视为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作曲家，因此凯斯勒伯爵很想介绍两位艺术家认识，岂料两个人的交谈，一开始就话不投机。尼卡表弟后来对那次见面有详细逼真的描述，这里只简要介绍当时的一些情景。

里尔克浑身上下裹着苏格兰毛毯，蜷缩在三角钢琴对面的沙发上，不时地咳嗽。他见到尼卡，笑了笑，有气无力地问：你是彼得堡人，莫斯科人，还是俄国其他什么地方的人？俄国太大了，是不是？说罢，又笑了笑。

尼卡说：小时候生活在国外，后来在彼得堡长大，没有去过莫斯科。

里尔克大为惊讶：一个俄国人没去过莫斯科，这真是少见。那可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城市，俄国的圣地，很特别，和欧洲的其它城市都不一样，一半亚洲，一半欧洲。不过，你还年轻，总会有机会去莫斯科的。

凯斯勒伯爵在一旁插言：他正在流亡呢，几年前，俄国革命发生以后，他就跟着家人逃离了俄国。

啊，里尔克点点头，我明白了。真遗憾，不过，你最终还是能回去的，因为我听说战乱终结以后，列宁政府已完全掌控时局，俄国社会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他们肯定会召你回去，他们需要你这样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尼卡表弟：我和我母亲，加上我们一家人都是在1919年逃离俄国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打算回去。

一阵沉默……

接下来，里尔克把话题转向俄国文学，谈起契柯夫，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又过了一会，他忽然又说：我真不好意思这么问，尤其是当我已经知道你的出身和可能会有的敌意，不过，我每见一个俄国人，都必然问这个问题。

里尔克看着尼卡的目光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对列宁很充满了好奇，但我对他了解得很少。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列宁？我总觉得——也许我的理解有误——他是——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告诉我，你怎么看？

尼卡表弟对这些话很反感，于是调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列宁本人和他的主张做了尖锐的抨击。就在尼卡的长篇大论行将结束的时候，里尔克忽地坐起身来，揭开身上裹着的苏格兰毛毯，两只眼睛阴沉地盯着地板，然后拿起靠在沙发旁边的手杖，费力地站起身来。在离开屋子前的一分钟，他用眼睛盯着尼卡表弟，说出下面的一句话，语气既疲倦又严峻：很感谢，你让我有了一次绝妙的斯拉夫体验。

这句话让尼卡感到莫名其妙，他不知道里尔克是不是话里有话。

如果对当时的文献做些研究，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对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左不右的道路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真正中立，除非你甘愿当一个异类。因此，后来在冷战期间，尼卡表弟被深深卷入文化自由议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工作，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第一次发现尼卡表弟的真实身份时，我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尼卡表弟，一个甘愿为中情局服务的作曲家？简直不可能！我清楚地记得那张黑白照片，尼卡表弟和纳博科夫在1974年在蒙特勒宫酒店里的合影：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镜头聚焦了他们的侧面，背景是那扇略显模糊的威尼斯玻璃窗，我曾经专程访问那家酒店。

神秘的尼卡表弟，他和纳博科夫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透露他主持的文化自由议会的工作呢？譬如，纳博科夫是不是知道，尼卡表弟成功策反了著名波兰诗人米沃什，为西方世界塑造了第一名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持不同政见者呢？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纳博科夫本人死活不沾政治的边，比起尼卡表弟，比起里尔克，他是一个十足的异类。我用“异类”这个词，而不用“中立”来描述他，是因为“异类”表现的是某种生存的状态，某种无法选择的生活困境，它比“中立”更准确。不过，“异类”毕竟是极少数。我们仔细考察奥威尔和库斯勒等人由左到右的政治变节，就可以看明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尤其是斯大林上台以后，西方知识分子无论从左到右的变节，抑或从右到左的变节，不仅多有发生，而且普遍。但是纳博科夫会变节吗？似乎不可能，这个问题对他没意义。

纳博科夫当一个“异类”，这是他的宿命。他痛恨高尔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但同时也瞧不起右翼作家。他在1959年为《邀请砍头》一书写的自序里，把奥威尔斥为“只会替概念插图、搬弄新闻故事的人”。我初读这句评语的时候，吃了一惊，可仔细一想，倒也不奇怪，也只有纳博科夫，可以如此出口不逊。宁可孤芳自赏，也不依附权势，这是纳博科夫的姿态，是他坚持了一生的异类姿态。他这样做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结果是，所有的权势都不买他的账，这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凡是有权势的文学机构，都拒绝给他发奖，尽管纳博科夫的读者和粉丝可能比谁都多，遍及了全世界。在互联网上，至今可以看到各国粉丝的愤懑：比纳博科夫逊色很多的二三流作家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为什么？

瑞典学院评奖委员为什么单单把这个一流作家遗漏了？我想，真实的原因往往说不出口，因为它与文学无关。

而纳博科夫的眼里只有文学，他在剑桥与奈思毕特能够成为朋友，是因为他们共同热爱文学，两人不断争吵，那是因为奈思毕特崇尚列宁和俄国革命，而纳博科夫不能容忍这个社会主义信徒的政治态度，尽管他的理由可能与尼卡表弟完全不同。

46

我经常想，奈思毕特这个谜如此费解，为什么？

纳博科夫的书里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一个死结再难解，无非是绕成一团的线，慵懒而优美的线；人的肉眼能看清那一圈又一圈的脉络，但笨拙的手指却解不开，弄不好还会出血。奈思毕特可能就是这样一团线。它的脉络在哪里？

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我很快就体验到自己眼睛和手指

多么笨拙。

海耶克和魏丁顿之间的冲突，固然和我关心的“剑桥帮”有关系，但毕竟不能提供多少直接有用的线索，甚至也不能提供什么间接有用的证据。我还得重新研究魏丁顿。不过，我这次仔细阅读这位科学家的生平传记，蓦地呆住了，好像被人当头棒喝：原来魏丁顿在剑桥大学毕业的年代是1926年，比纳博科夫晚几年上大学，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是同窗，魏丁顿因此也不会是奈思毕特面具背后的人。

我又一次陷入六个字母之谜难以破解的困境。

一个如此明显的细节，为什么被我忽略了？说来说去，只怪自己太粗心大意，我为了找到手执烟斗的奈思毕特，结果被魏丁顿手执烟斗的形象误导了，从而忽略了一个关键的日期。

我不由得想起《塞·纳特的真实生活》里的那只金黄色的大柑子，每次读到它滚落下来，砸在纳特的脚上，我都拍手叫绝，把这叫作纳博科夫的神来之笔。没想到，如今自己一脚踏进纳特的心理轨迹，倒不是被一只柑子，而是被突然滚落的“1926年”重重砸了一下。

奈思毕特呀，奈思毕特，你究竟是谁？

在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难题出现，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字眼都会构成巨大的路障，多少天都像遇到了“鬼打墙”，走了多少路，其实都是原地打转；可是一旦绕开旧路，另辟思路，就可能视野大开，远方出现一道靓丽的风光。为了自勉，我把清人袁枚的一首五言绝句工工整整抄录下来，贴在书房的墙上：

雨过山洗容  
云来山入梦  
云雨自来往  
青山原不动

47

冬日悄然而至，给天空渐渐蒙上一层惨淡的灰色。从我住的公寓楼往下望去，街上车流如注，行人匆匆，惟独路旁矗立的橡树纹丝不动，光秃秃的枝桠直刺天空。

临近感恩节的一个清晨，雪花漫天飘舞，恍若暮春飞絮。一场大雪奇迹般地淹没了都市的喧闹。及至傍晚时分，路面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我踏着积雪，匆匆赶到艺术学院去听一个电影讲座。一星期前，我偶尔经过艺术学院的布告栏，被一个醒目的讲座预告吸引住，驻足细看，原来与电影《公民凯恩》和美国报业垄断史的历史有关，我于是决定要去听这个讲座。

但雪夜的讲座叫我大失所望，主讲人过于沉溺于电影史自身的发展，对《公民凯恩》的讨论和分析则流于一般，缺乏新意。不过平心而论，听这讲座我不是全无收获，那位学者在讲述美国独立制片电影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提起一件事，他说《公民凯恩》的导演奥森·威尔斯的名字，曾经出现在乔治·奥威尔交给英国谍报部门IRD的黑名单上，并且，奥威尔不但把威尔斯写进黑名单，还在他的名字旁边打了两个问号——这个细节忽然提醒了我一件事。

奥威尔的名字像是一把神秘的钥匙，重新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把我带回到

几年前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高桌用餐的情景。那天晚上，M教授第一次提起奥威尔的黑名单，他向我转述了英国《卫报》发布的那条爆炸性的新闻。从剑桥返回纽约后，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把奥威尔的黑名单找来做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剑桥背景的科学家，我没有发现更重要的线索。事后，我把奥威尔这人，连同他的黑名单，就都放下了。

由于一心惦记着奥威尔笔记本上的名单，电影讲座刚一结束，我匆匆地往家中赶。路上的积雪已经被行人踩踏得坚硬无比，走起来一步一滑，我不管不顾地在昏黄的路灯下一路疾走。进了家门，甩下湿漉漉的靴子，径直奔向书柜的最下面的一格，那里有我保存的前几年复印的一大摞文件。我在这些复印文件中来回翻找，十多分钟后，终于把奥威尔的黑名单从里面抽了出来。

果然，奥森·威尔斯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48

二战结束的那些年，举世轰动的小说有两部，一部是《一九八四》，另一部是《动物庄园》，这两部政治寓言小说使得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声名大振（他的真名是艾力克·亚瑟·布莱尔 Eric Arthur Blair），就连这个笔名也被纳入了普通英文词汇，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 Orwellian。我教过的美国学生，没有读过《鲁滨逊漂流记》的人不少，没读过《一九八四》或《动物庄园》的人，几乎没有。

有的时候，作家的命运很诡异。比如奥威尔，他的《动物庄园》写成后，出版过程极其曲折，一度到处碰壁，书稿在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旅行，又被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先后退还。想当初，他的报告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由出版家维克多·郭兰兹一手策划出版的，郭兰兹是最早鼓励奥威尔走上写作道路的人，但是就连这位朋友也拒绝出版《动物庄园》，理由是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写得过于粗糙，文学上不成功。

公平地讲，郭兰兹是伦敦著名的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发起人，他的政治立场和亲苏态度，肯定多少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他看不上《动物庄园》或许和这些背景有关——顺便说一句，他的名字后来也被奥威尔写入黑名单。但是在1944年，让奥威尔最为苦恼的，是他分别接到艾略特和燕卜苏写给他的信，这两个人不留情面，言辞直白，指出《动物庄园》构思中有许多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地方，认为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艾略特和郭兰兹不同，他是有名的右翼保守派，燕卜苏也不是左翼作家，这两个人也对《动物庄园》如此否定，对奥威尔来说自然是雪上加霜。

但接下来，事情变得迷离扑朔，甚至有些神秘兮兮。既然奥威尔的文学同行一致认为《动物庄园》写得不成功，出版社也不愿意接手，那么到后来这部书稿如何转眼变成了铅字？何况，书稿变成铅字还远不是故事的结束，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动画片，几年之内风靡世界，与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并驾齐驱，成为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文学作品。直到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动物庄园》推崇为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将其划入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

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推力？

我平时爱读侦探小说，喜欢设计精巧的奇诡故事和情节，可当我深入研究奥威尔的材料，特别是近年陆续曝光的有关档案，我受到的心理冲击已经不能用惊

讶来形容，原来其中的奇诡和奥妙不仅超越了侦探小说，而且让人联想起近来十分流行的阴谋论。

故事说起来很长：种种材料档案揭示，《动物庄园》真有幕后推手——正在这部书稿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英国谍报部门 IRD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忽然对它发生兴趣，并及时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IRD 与军情六处有直接联系，他们动用的是国家资源，自然无往不利。《动物庄园》这本书不仅顺利出版，并且和《一九八四》一道，被译成了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中文等几十种语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普及。于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了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

这一成就难道不足以让艾略特、燕卜苏和纳博科夫三位大家无地自容吗？

事情听上去像传奇故事，我自己开始也不信。后来看了《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这本书，我恍然大悟，才知道那是事实，不承认也不行。这本书作者名字叫桑德斯，她的英文原书标题叫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前些年已经被译成中文。桑德斯在这本书里披露，冷战开始之后，英美谍报部门实行了全方位的运作，无所不用，无所不能，其中包括赞助出版社，渗透学术机构，成立所谓的“门面”(front)出版社，举办文学艺术节，大搞评奖活动，可谓竭尽全力。最让我无法理解的做法是，西方谍报人员从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的诗篇里读出了微言大义，先是慷慨出资，把它译成俄文，然后动用飞机把这首诗以撒传单的方式，空投到苏联境内！

一首诗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恐怕在世界诗歌史上也空前绝后。不过，奇怪的是，艾略特的这首诗我读过很多遍，至今看不出它的微言大义在哪里。

朝上看的人，看瞎了眼，看出一个幻觉

朝下看的人，看到对眼，看出一个幻觉<sup>1</sup>

桑德斯统计，IRD 和美国中情局策划出版的文学作品、期刊和学术著作，加起来有几千种，其中以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最成功，此外还包括格拉斯的《新阶级》，米沃什的诗歌翻译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众多作品。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中国的文革期间被称作“黄皮书”的那些外国译著，其中相当一部分不都是这一类出版物吗？近年来，我看到很多人的回忆，他们都说外来的“黄皮书”通过地下传播的渠道，从北京传到全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思想。

历史之路竟是如此幽深曲折。

49

其实，奥威尔的故事还没有完。

冷战结束以后，一些罕为人知的内幕陆续曝光，在 1996 年，英国情报调查处 IRD 的部分档案也开始解密。解密后的文件刚被送到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英国《卫报》的一名记者马上跑去审阅。记者在编号为 F01110/189 的文件夹里，发现了一份奥威尔在 1949 年向 IRD 秘密递交的黑名单，上面罗列了殴美两国进步人士的名字，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共产党人的同路人，其中的 35 人的名字，

<sup>1</sup>西川诗《试着从熬头的方面给“人群”下定义》。

最先被媒体披露出来——这批名单是奥威尔在医院养病时交给他的女友西莉亚·克宛 (Celia Kirwan) 的。克宛是 IRD 的谍报人员，奥威尔一直在苦苦追求这位美女，尽管他的追求不顺利，连求婚也被拒，但是他依然迷恋这个女人。当克宛告诉奥威尔，IRD 需要收集情报来对付斯大林和苏共的时候，他欣然同意合作，并从此开始了他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的双重生涯。

奥威尔与英国国家谍报部门合作的内幕一经曝光，惊动了欧美知识界和他的众多粉丝，一时间舆论哗然，奥威尔在谴责极权主义中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忽然之间变得岌岌可危。

然而，即便如此，奥威尔的道德危机并没有到达高潮，1996 年被揭出的“黑名单”还有后续。因为七年之后，又有记者发掘新的证据，奥威尔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笔记本，这个本子长 19.8 公分，宽 16.5 公分，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奥威尔在这个笔记本里，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从 A 到 Z，共 135 个人。每个姓名旁边都写有批注，表明这个人 CP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那个人是 FT (fellow traveler 共产党同路人)，这个人尤是犹太人，那个人是爱尔兰人，等等。真相大白，原来这个笔记本才是早先披露的黑名单的真正来源。

上天不负有心人。奥威尔的“黑名单”一旦重新进入我的视野，我马上就有直觉，它和我对六个字母之谜的追索说不定有关，甚至，也许它能为我提供有助于揭开谜底的关键线索。

我把奥威尔的笔记本上 135 人的名单仔细分析了一下，惊讶地发现，这些人中不但有科学家、作家、剧作家、导演、演员、学者、记者，甚至还有外交官和美国政客（副总统）等，其中很多名字都为大家所熟悉，例如：

贝尔纳（物理学家）  
卓别林（电影演员）  
萧伯纳（剧作家）  
辛克莱（小说家）  
斯坦贝克（小说家）  
布莱克特（物理学家，1948 年诺贝尔奖得主）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第 33 届美国副总统）  
奥森·威尔斯（《公民凯恩》导演）  
迈克·雷德格瑞夫（演员）  
埃德加·斯诺（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记者）  
J. B. 普利斯特利（剧作家/小说家）  
保罗·罗伯逊（歌手/演员）  
索利·朱克曼（生物学家，师从贝尔纳）  
连姆·欧弗拉赫提（小说家）  
维克多·郭阑兹（出版家，左翼图书俱乐部发起人之一）  
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家）  
胡雷特·约翰逊（坎特伯雷教长）  
塞希尔·戴-路易斯（爱尔兰桂冠诗人）  
李阿姆·欧弗拉赫提（小说家）  
约瑟夫·迈克里尔德（作家、BBC 主播）  
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纽约市长）

珍妮·佛兰娜（《纽约客》驻巴黎专栏作家）  
芙丽达·柯其威（The Nation《民族》周刊主编）  
等等

上面摘出的二十几个名字，当然仅仅是冰山一角。仔细分辨一下，在这些人当中，剑桥大学教授和具有剑桥本科背景的人就有四位：贝尔纳、布莱克特、普利斯特利、还有雷德格瑞夫。

那么，这些人当中谁最有可能是奈斯毕特？

我推测，奈思毕特若真有其人，他免不了被奥威尔写入黑名单。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漏网之鱼，例如，我在笔记本里没有找到李约瑟的名字，觉得很奇怪，来回复查几遍，真的，李约瑟名字不在里面。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十分蹊跷。李约瑟和贝尔纳都上过美国中情局的名单，由于这个原因，战后当他们应邀去美国大学讲学的时候，签证被拒，不能如期前往。这种情况在奥威尔的黑名单被公布之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令人费解的是，奥威尔不但认识李约瑟，熟悉他的政治倾向，而且两人之间还有不少的通信往来，二战期间，奥威尔在BBC广播电台主持“人声”（Voice）节目时，李约瑟、贝尔纳、艾略特、燕卜苏、小说家 E. M. 福斯特都曾被邀请做他的嘉宾，结果是，贝尔纳上了他的黑名单，而李约瑟却成漏网之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奥威尔的疏忽，还是另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50

我费了很大的功夫，仍然无法解开这个谜，但在一连串的阅读中，我却偶尔发现奥威尔在BBC广播电台工作那些年，《大公报》的记者萧乾正好也在英国，由此猜测，他们两人在二战期间可能打过交道。

这里面有没有新的线索可寻？

为什么会想到萧乾？那是因为有一天深夜，我把电视机打开，正逢公共电视频道在播放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纪录片，看着伦敦的男女老少井然有序地走进地铁防空设施的画面，我忽然记起萧乾的伦敦日记，那是我多年前读过的。于是我想到，萧乾在英国的那几年，他和奥威尔相识吗？

这个突发的奇想，在我的脑子虽然只是一瞬，但萧乾这个人，还有他的书，在我的记忆里犹如一幕幕戏剧一样活跃起来。他的回忆录非常精彩，对我特别重要的是，他的书里讲过不少英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轶事，几乎所有活着的英国作家都进入了他的视野。萧乾不仅和 E·M·福斯特建立了特殊的情谊，就连奥威尔黑名单上的英国作家——普利斯特利——也被他记上了一笔。

我读萧乾，总被他书中的细节所吸引，一只狸花猫的眼神，汽车上遇到的醉汉，还有泰晤士河上漂浮的士兵尸体，肿胀的背上刺着“我爱娜拉”的字样，和一颗被锁链缠绕的心……这些转瞬即逝的历史碎屑，都被他用的文字织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让人难忘。也正是由于萧乾对细节的重视，我才知道敦克尔克之役之后普利斯特利在BBC无线电台播放的那些鼓舞士气的节目。

我不由得又生感慨，同样在伦敦，同样在剑桥，尽管前后相差十几年，为什么萧乾的眼睛看到的那么多？徐志摩的眼睛看到的那么少？

为了弄清萧乾和奥威尔是否打过交道，我开始细致地检阅萧乾的生平，发现从1939年到1944年，他的活动半径大致在伦敦和剑桥之间。他先是应聘在伦敦

大学的亚非学院教中文，后来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读英国文学硕士。1942年萧乾首次身披黑袍，头戴方帽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开始真正体验“牛桥”的生活氛围。

萧乾被分配到D字2号宿舍，D字是剑桥宿舍楼梯的编码。对穷孩子出身的萧乾来说，这个宿舍套间简直是奢侈无比，书房和卧室的家具配套齐全，舒适宽敞，壁炉两旁是书架，沿三面墙还摆开沙发和软椅，一次可坐十几位客人。书房东窗正对国王学院的教堂，早晨隔着大草坪望去，教堂的影子在绿茵茵的草坪上拖得很长。

大学草坪尽管很完美，但是一个人想要在上面走一走，那可不容易。在当时，剑桥大学有明确规定：没有获得学士头衔的学生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不得脚踏青草横穿草坪；（男性）研究生的待遇略高一等，他们有资格擦着草坪边缘行走；当然教授的待遇最好，可以大阔步从草坪中间穿过。纳博科夫1919年入校时住在三一学院主院，宿舍的楼梯编号是R字，6号房间，不过，他的经历和萧乾的感受几乎相反。对贵族出身的纳博科夫来说，在剑桥上学的那几年简直和异地流放相差无几，其中让他不高兴的事，就有穿越草坪的麻烦——他几次被斋务长或稽查员（被学生称作“斗犬”的管理人员）记过，原因只有一个，不遵守纪律，故意横穿草坪，罚款。

这里不能不提一句的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她穿行在剑桥大学的草坪上，忽见一身穿制服的人急冲过来，一脸的惊诧和愤怒，明白自己犯了忌，伍尔夫赶忙转回到卵石路上绕行。其实，当年伍尔夫在剑桥所碰到的不痛快，不止草坪一个地方，比如剑桥大学图书馆，也有禁忌。那时候，这地方只对男性开放，包括本科生中的男生，而女性——假若没有院士的陪伴或没有携带介绍信——对不起，大学图书馆也是禁区。有一回，伍尔夫被一个彬彬有礼的看门人挡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大门外，她大惑不解，并因此而耿耿于怀。后来，她用作家的独特方式实行了报复，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那篇文章里，把牛桥的这些丑闻陋习都写进去，算是立此存照。

萧乾在剑桥大学，可能算胆子最小的一个，他一辈子循规蹈矩。刚入校的时候，他在国王学院餐厅遇到一个纨绔子弟，言谈之中，那位英国同学教唆他夜间出去鬼混。萧乾问，夜间学院的宿舍大门上锁，怎么办？那人满不在乎地介绍了三十种翻院墙的诀窍，萧乾听完一本正经地说：我从小不会上房淘气，更不想在这里惹是生非。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将这些细节都如实记了下来，同时也记载了贵族子弟调皮捣蛋，惹事生非的其他生活细节。

纨绔子弟恶作剧的传统在“牛桥”屡见不鲜。一天早晨，萧乾出门，看到国王学院旁边的大学评议会大楼的旗杆上，高悬一辆自行车和一件粉红色的女内衣，路人纷纷驻足观看，赞叹于这种勾当的人本领高强。学校当局一时束手无策，一直等到下午，才找到能手爬上去，取下半空中的展览物。还有一次，萧乾的宿舍楼有一位同学以熟睡闻名，一个夜晚，有恶作剧者把草坪上放牧的一匹马牵进这个同学一楼的卧房，等他早晨睁眼的时候，才发现房间里有一匹马正不安地在地上转悠，地板上，四处撒着湿臭的马粪。

萧乾在英国交友广泛，他的朋友圈子里既有作家和科学家，也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如果钻进他的纵横交错的社交网络，在那里仔细寻觅，说不定我会有新的发现。翻检萧乾的材料越多，对这一点，我就越有信心。譬如《黑色的雅典娜》的作者小贝尔纳回忆说，他5岁的时候，见过萧乾一次，这位中国作家还送了一本书给他，书名叫《中国不是震旦》。小贝尔纳不到认字的年龄，就得到一本萧

乾的英文著作，那是他第一次与中国人打交道。长大以后，他在剑桥上大学，选修中文课，这说不定就和儿时的记忆有关。小贝尔纳还特别提到，萧乾是他的父亲老贝尔纳和母亲玛格丽特的好朋友，这一层联系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 与天下共醒的日子

曲磊磊

曲磊磊，1951年生，北京三中67届老初二学生。曾当过知青，士兵，工人，中央电视台美术设计，曾为《今天》画页和插图作者，《星星美展》组织者之一，1985年起旅居英国，职业画家。

半个多世纪，如同翻山越岭，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再上……数不清翻了多少山，越了几道岭，现在还在翻，还要越。

年代若以十年记，我的“七十年代”当是1969到1979，这十年中翻了三座山，雄关漫道。第一座是四年的军旅生涯，在坚定和惶惑、荣辱与悲喜、沉浮、荒诞和思考中，开始人性的觉醒，尤其是1971年；第二座是1973年后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供职，上天入地，纵横八方，对社会人生的了解，对艺术的痴心追求，导致1976年剧变，集五千年历史为一瞬，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自认完成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转折；第三座山，便是企图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寻求，激荡的热情，痛苦的尊严，在探索和希望中，置身当代艺术运动，以1979年“星星画展”的经历，写下那个岁月的一页，也由此确定了艺术方向。

囿于篇幅，暂且说说四年军旅生涯的二三事。

一

知青生活的结束，军人生活的开始，都在突然之间，像刀切一样，身不由己。

1969年的夏天，我是一个叫三部落的小山村的赤脚医生，接到县里通知，说是父母有事叫我回北京一趟。我顾不上多想，把麻雀般小诊所的各种珍贵的药品、器械以及近期患者的状况，一一跟我的助手做了交代，便搭上进县城的马车，呼吸着透明的阳光下清澈的风，看着熟悉的山水草木，溪流野花，匆匆上路。

北京的家住的是那种五十年代苏式的房子，从小住惯了，闭着眼都跑不错的楼梯。在楼道里就听见我们家里人声鼎沸，欢声笑语从大门透出来，自从文化革命开始，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开门进屋，客厅里烟雾缭绕，窗外的阳光像剑一样，斜着，直直洒落，闪亮着分割屋里的空间。窗台上和靠近窗台的地上，高低错落的花正在盛开，交映着红领章和绿军装，一片红红绿绿。我意识到这屋里的军人都曾是父亲的老战友，军人说话习惯于大声喊，正在谈论某年某月的一场战斗。

“回来啦！”还没等我开口，父亲便满面春风地喊道：

“来来来，见见爸爸这些老战友！”

他一一给我介绍，这位是112师的师长，这位是112师的政委，这位是114师的师长……我一跟这些叔叔们握手，听说过，没见过，他们原都是父亲的部下，如今都是军中大员。那位112师政委看上去文质彬彬，笑着说：

“明天就去吧！”

“上哪儿去呀？”我问，

“当兵去!就到爸爸的老部队!”父亲高声说道,心畅神驰。  
这太突然了!  
可一切就这么决定了。

我从来都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相当好,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从北京去的团部营房。肯定是坐火车去的,但是所有的细节都荡然无存,只记得一个参谋来接我,走出陌生的固城火车站,平生第一次坐在长江牌三轮摩托车的挎斗里,贴着地皮飞驰。

置身进到营房大院,一切都是直线。笔直的高大围墙,围墙上刷着笔直的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两排笔直的杨树灰绿的叶子闪烁,树干一米多高处刷上笔直的白灰,还见有士兵操练,挥动的手臂踢出的脚,都是笔直的直线。

我属于非正式招兵期间入伍,后来人称“后门儿兵”。我被编入二连五班。连长和指导员说,我们的连队是‘红二连’。在军中冠以红字的,历史背景都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这个连队跟朱德、林彪都能挂上关系。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新兵到连队报到,居然是在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的化工冶金研究所。几天之间,我从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一变而成了控制和管理最高级知识分子的军宣队。

我军当时全面进驻中国科学院,号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团下属的各连、各班都驻扎并分管各个研究所,如物理所、动物所、植物所、数学所,等等,主管各研究所、各科室的学习和运动。每个所还有上级委派的军代表,我们军宣队的实际任务是了解和掌握所有细节和动态,说白了,是军代表的助手和耳目。而我们连分管的化工冶金研究所,是化学和冶金交叉的边缘学科,不是通常的平炉、电炉一类以物理方法炼金属,而是用化学的方法去分解合成极为稀有和特殊性质的金属,用于科技、国防的高精尖领域。所长叶渚沛,是这个领域国际著名科学家,是周恩来把他从美国请回来,并设立了这个研究所。他的太太是美国人,也跟着他来到中国。文革开始后,在科学院,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实验室里的炉子、设备,久已闲置。人们除了搞运动、政治学习之外,不知道还能干什么。研究员们都是人中的尖子,该说话的时候,官话、套话,都很得体,没有漏洞,闲下来时,也会扯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有一个研究员爱吹小号,没事的时候就打开窗户向外吹。一位广东籍研究员描述各种肉的吃法,他说他还吃过老虎肉。

我是新兵初到,很少说话,主要是听别人说,了解情况。直到有一天,根据上面的精神,开始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研究员们都显示出比平时消除派性、大批判和政治学习高得多的兴致。

“老曲说几句吧。”一位研究员提议,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虽然我才十八岁,被称老曲,是地位的关系。我没有思想准备,颇感窘迫,但不得不说。我先说对相对论并不了解,知道很有名,很重要,但是科学有阶级性吗?在座的都是科学工作者,我还得向各位学习,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要富强,没有科学是不可能的。

我发现人们的目光变得郑重起来,翘起的椅子腿也放平了,嘴里的牙签也扔到烟灰缸里。

接着,我就开始扯到哲学、辩证法,不是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变吗?自然规律、生活世事,以至国内外形势、党的政策,也都在变,政治斗争很复杂,一时看起来对的,另一时就不见得对,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原则很重要,否则会成为跟风派、机会主义,最后吃亏的是自己。云云。十来分钟,大概说了这么个意思。这分明

不是一个当兵的说的话。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班长让我到连部送材料。那时科学院都是五十年代苏联式的灰楼，路大多是煤渣铺的。一排一排的柏树，像墙一样。突然听见有人叫“小曲”。我一看是所里的女研究员许以明站在柏树墙边，清瘦，高高的额头，头发整齐地梳在后面。班长和一个老兵都提醒过我要提防这个人，说她非常狡猾，不好对付。

她看看四周，不紧不慢很优雅，“刚才看见你走过去，所以在这儿等你，这儿没什么人，想跟你说几句话。”我说好啊，她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这我相信，这些高智商科学家只须三来二去，就能把我们的底儿摸清。“你那天的话说得很好，但是我有点为你担心，只想提醒你一句，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是军宣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你说话可千万要小心啊，别出格，别给自己找麻烦！”从这几句话就足以判断一个人了，我连声道谢。

她看着我的眼睛，“我有一件东西，保存了好多年了，现在我想送给你。”说着，从兜里掏出钱包，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黑白照片，是那种120相机拍的小方块儿，照片上是我的父亲在作报告，站在讲台上，背着手，笑得爽朗。

一定是女三中了！因为《林海雪原》一书在五十年代的成功，邀请他讲座的接应不暇，但因为父亲太忙，为人又低调，所以基本上只接受了我们兄弟姐妹所在学校的邀请。我告诉许以明我姐姐是女三中的，她说她知道。姐姐上初中的时候，她已经在女三中上高中了。

我看着她远去的清瘦的背影，拿着那张小照片站了很久。那是1969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很想再见到她。

部队领导最关注的是业绩，最彰显业绩的是报纸，我满耳灌注的是革命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我既然是部队老首长兼作家的儿子，自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一些光荣使命，把一些写好的稿子，通过父亲的老朋友、老关系，送到京城各大报刊，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直到北京日报和北京军区战友报。从中我倒是乐得有了不少回家的机会。从中关村进城，过了白石桥不远就是我家，那地方叫百万庄，解放军报社离我家不过一箭之遥。过家门是一定要入的。

这一天我顺路回到家。父亲屋里挂了很多天文图，桌上也是天文学的书籍，他的脑子永远也闲不住，询问下才知道，他并非凭空添了爱好，而是在为日后的写作做准备，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和资料。见我回家非常高兴，仔细询问着军队生活上上下下的各种细节，以及科学院的状况，不时显出忧心忡忡。父亲问到我最近院里在做什么，我说在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紧皱着眉问我，知道相对论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一边学一边批吧。这时他勃然大怒，一巴掌拍在茶几上，茶杯都跳起来：“你们连相对论是什么都不知道，批他妈个屁哇！”

临走时，父亲一再嘱咐我，不要胡来，不要多说话，要尊重科学，特别要尊重科学家，我们家人也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家的多少亲朋好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这都是国家的宝贝，政治运动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没有生产，国家就完蛋了，等等，等等，我牢记。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间，母亲被落实政策，安排到北大医院当了“三结合”的院长。说是院长，但之上还有从炮兵派来的军代表，实际上是第二把手。她上任开始就面对一片混乱。在军代表的指挥下，医院的科室制被改成了连排制，内外妇儿，统统改头换面，很多患者看病找不着北。神经科统统合并到内科连，鼎鼎有名的神经科主任，成了普通内科大夫，眼科和耳鼻喉科合并成五官连，军代表

说，“眼睛和鼻子耳朵，离得这么近，为什么要分开？”而化验室、药房、放射科以及后勤部门等等，统统合并成一个辅助连。一天在病房，母亲迎面碰到内科主任王叔咸正在推车送饭，他是国内外有名的一级教授，病房里年轻医生，造反派技术员和工农兵学员在查房。我妈拉着他的手问，“王教授，你怎么在送饭呢？”教授悄悄把我妈拉到一边低声说：“我现在是被批判的。”一天我正好又是顺路回家，听母亲怒气冲天地说起医院这些事儿，我说这军人真是瞎指挥，“什么瞎指挥！”她说话从来底气足，“是胡闹！这些外行人根本不懂医疗和教学，医院是多么复杂严密的机构，治病救人是多么大的责任，大医院承担医疗和教学双重工作，培养一个好医生是多艰难。军代表动不动说四六年就当兵参加了革命，我那时候已经是军区野战医院的院长了。”说到教育革命和学制缩短的改革，母亲认为绝对不适合于医科大学。文革前她任北京医学院领导之前，长期领导医学院的基础部，十几个专业，那时医科大学是六年制，学生前三年学习其他大学都有的基础课，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再加上医学专业课，像生理、病理、免疫、微生物、解剖学等等，然后上专业课三年，临床实习，才能毕业当医生。所以文革前北京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广东中山医学院这三所大学的文凭，国际上承认的。

这就能懂得，为什么母亲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拆掉连排制，恢复科室制，她为此上下呼吁做工作，从卫生部到北京市到医护人员；第二件事就是大批给教授专家解放平反。所以也就能懂得，为什么她不久之后，在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中再遭批判。对母亲在政治风浪中的清醒和原则，我一向钦佩之至。在她的批判会上，她一言不发，别人都说完了，最后她念了一段党章，说：“共产党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逐级向上反映，直至中央。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散会时军代表面色铁青。

有一件事必须提及，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军代表，包括他们的家属，看病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主任和专家教授的。

我学会了抽烟。

初秋的一天，接到通知，军宣队全体官兵和各研究所研究员到科学院大礼堂看电影。不知道看什么电影，反正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灯暗开演，竟然是阿波罗十一号登月！我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跳急速，屏住呼吸，看见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7月21号出了登月舱踏上月球，听着翻译说出指令长的名言“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时，我都快喊出声了。坐在我旁边的，我们班的一个战士正在打瞌睡，提醒了我的身份。我挺直腰杆，坐在礼堂皮椅的前沿儿，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点细节。眼界突然间开了个缝，一束光照到心里，想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在干什么。放映结束时，军代表出现在台上，说大家回去要批判，地球上的事还没弄好，上月亮干什么？资产阶级嘛，就是要赚钱……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扯你妈的蛋！”我心说，没敢说出声。

这回是我迫不及待地主动找了个机会进城送稿子，箭步窜回家，是为了跟我爸说说这惊天动地的一幕。父亲刚听了一句“美国人登上月亮了”，旋即忽地站起来，一脚轻一脚重地走进卧室，穿上他的皮鞋，再回到客厅激动地来回走。我爸一遇到大事、要事的时候，马上先去穿鞋。他是在辽沈战役中，右腿的大腿骨被打断了。骨头是错位接上的，右腿比左腿短两寸，终身残疾。他的鞋是特制的，右脚鞋跟高一块，里面还垫一块。上小学的时候，小孩吵架，有的孩子对我喊“你爸是瘸子”，我也喊，“你妈逼，我爸是残废军人，是英雄！”我从没觉得父亲是

个瘸子。此时他一脚轻一脚重地在屋子里踱步，一边听我尽可能详细地描述阿波罗 11 号登月的过程。

那天离开家前，我跟父亲又谈了一些科学、历史和政治形势的话题，再一次听他反反复复的关于尊重科学和科学家的叮嘱。

所里还在批判叶渚沛的反动学术，没有任何科学研究的机会，他的美国太太给周恩来写信，也石沉大海。

一场秋雨之后，化冶所周围煤渣子路坑坑洼洼。有坑的地方积了不少水。我从连部办完事回班里，远远看见叶渚沛所长朝这边走过来。一身蓝布制服，风纪扣都扣得很规整，带着一顶同样的蓝布解放帽，有几分滑稽。四周无人，我突然觉得应该跟他说点儿什么，哪怕他能得到一点儿宽心和安慰。说什么呢？正想着，走近了。他看见了我，赶紧一步站到路边，低着头站到雨水坑里，把干的地面让出来。我想起我妈医院里的教授，忽然觉得很难过。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说：“您多保重啊！”除了这几个字，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话。他抬起头看着我，好像没听懂，又好像听懂了，像哭又像笑的表情抽搐凝固了几秒钟，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巧遇，我反复想了好久，我欣慰自己能对他说句话，也希望他能得到一丝温暖，但是没有把握，因为我想明白了，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想，在他的眼睛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器，是一个专政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他看到的是帽子正中的一颗红星和领子上的两面红旗。叶渚沛所长恐怕早已离世了，不知他在有生之年是否还有机会从事他的科学研究，也不知他是否曾经记得有一个当兵的，对他表示过一丝敬意和关怀。

初冬，突然接到撤军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某日零点之前，部队全部撤出中国科学院。撤军原因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军人的第一天职。

那天午夜时分离开北京。部队的大卡车，如长龙，浩浩荡荡从中关村出发穿过北京市区。我又一次离开了北京。我和战友们用尽全力扯着嗓子唱军歌：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想用歌声惊动北京城，唤醒梦中的北京人。

## 二

终于第一次到了我们营的营房，在一个叫七里庄的村子外的一片山坡上，所以也叫七里庄营房，大约离易县县城七里路。那里山岗起伏，沟壑纵横，除了荒草、石头和一些散落僵硬的枣树，光秃秃的山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没想到这样如此贫瘠和苍凉的所在竟是一处历史悠久深厚之地。著名的易水从这里流过，易水河畔有座孤独的小山，名荆轲山，山上立着一座荆轲塔，四周断碑残文散乱，塔西荆轲的衣冠冢风雨荒草相伴。易县城东关和西关两座城门间是一条大街，城墙仍然高大，却已是断壁残垣。由此向西十五公里是清西陵，埋着雍正、嘉庆、道光 and 光绪四个皇帝；西北四十多公里过了十八盘，便是紫荆关，与居庸关、倒马关并称“内三关”，扼住北京的咽喉要道。往西南四十公里，是狼牙山，群峰状如狼牙，直刺穹苍。

新的任务很快下达。部队再次成为军宣队，全面进驻保定地区各县区社队支农，说是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实是控制和稳定这个地区的局势。我们红二连被派驻石庄公社，我和一个河南兵二人进驻中亢各庄村，那时叫中亢大队。

开始的社会调查并不顺利，见的第一个人是大队支书，漆黑的屋里小油灯旁，

他很快发现我对当地风土人情和民间传说有兴趣，便东扯西拉给我讲了一大堆故事，直到半夜，我也没对村里的阶级状况形成什么概念。只觉当地口音好听，说话像唱歌。睡觉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老油条！”由于人手不够，我负责的村很快从一个扩展到东、中、西亢三个村。接触的村民越多，了解的情况越多，就越错综复杂，历史遗留的政治、经济问题、个人恩怨、宗族问题，加上文革中派性的问题，等等，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东亢一个富农成分的汉子，额上青筋暴跳，眼泪汪汪地跟我谈了几乎整个通宵，觉得这回来了救星。原来他根本不是富农，是逃荒在这儿落户的，赤贫，就是因为他性格耿直，敢说敢干，得罪了村里领导，便屡受欺压。这个村的村长、支书、会计、民兵头儿、妇女主任等一应领导都是同姓同宗，一大家族占了百分之八十。最初土改时村里定了一个地主两个富农，后来每次运动，地主富农就增加几个，一度有十二个地主。我问，你们村一共才有多少地？出十二个地主！他说就是呀，上级也觉得不对头，后来一个纠偏运动，改正了大部分，还是剩了一个地主两个富农，可都不是原先那几个了，换人了！他不服，便反抗，便上告，结果越告越惨，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贫如洗。有没有运动都挨整。我很同情他，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设法向我觉得靠得住的人探求意见。听到的回答是：建国以来运动多了，人都学精了，历史问题很难查得清楚。军宣队能待几天？你们走了怎么办？再说你能为他一个人把全村一大半儿都打倒吗？我想来想去，真的没有办法，我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

冬天的早上，寒鸦鼓噪，挂在村里老榆树上的一截铁轨，反复敲得当当响，半个多钟头后，才有人稀稀拉拉扛着锄头出工。到地头一蹲，先抽袋烟，再走两圈，刨两下，几股烟儿。回家了。一天工才一两毛钱，秋后分粮食，恨不得粮钱都不够。

我们住在村里天天在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一天一家，一顿四两粮票，两毛钱。在第一家吃的是什，到下一家，再下一家，明天，后天，肯定一模一样，这是农民的精算，他们不能得罪任何人。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天天顿顿小米稀粥，地瓜面饼加咸菜。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给一个瘫痪在炕的老头儿扎了几次针灸，居然见好，他家硬留我吃了一碗鸡蛋挂面加荷包蛋。亢各庄离县城不过两三里地，有机会溜到县城，第一件事儿就是买上半斤猪头肉，蹲在没人的城墙根，狼吞虎咽地塞进肚子，擦擦手站起来，觉得很幸福，再去办事。

有一天我约排长谈谈工作，说：“我这两天一直琢磨咱们军宣队的任务和目的是什么？除了阶级斗争，我要是能看到明年或者后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点，他们吃得好点，我就觉得有成绩，要不然咱们就没成绩。”排长先没说话，想了一阵，看着我说：“想那么多干嘛？咱是当兵的，服从命令，上面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

上面要的成绩，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无数次的运动，能挖的早就挖出来了，能定的早就定了，凡运动都挨整的这些人下人，此时背上都缝着一块白布，写着他的名字、身份和罪行。一如纳粹德国时的犹太人。这时东亢各庄揪出一个姓董的富农，他是回民，有权主刀杀牛的阿訇，被举报暗地偷着杀牛。人民公社的牛属于生产资料，杀牛违法。但是由于食品的极度匮乏，黑市的牛肉生意也就应运而生。我自己插队时对牛感情深厚，**所以整起这个人来毫不手软**。那个冬夜在队部揭批董富农阿訇的群众大会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回荡在本来安静的乡村夜空，董富农阿訇坐在马灯下的条凳上，低头弓背，仍想法抵赖。我和班上的那个河南兵，身披军大衣，

坐在一边，尽量显得威严。僵了很长时间没什么结果，我站起来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带着河南兵走向门口，出门前看了民兵排长一眼。刚走进隔壁的小屋，那边就把董富农捆着双手腕吊到梁上了，皮带棍棒，混着鼎沸的呼喊嚎叫，喧嚣一片。我咬牙等了几分钟，站起来急急走回大屋，“放下来，放下来！不能打人，我们是有政策的！”

这件事最后怎么定的案，我并不知道。我们支农部队在那之前就撤走了。后来很多年想起这件事，总是纠结自问：“我算是个什么角色，从哪儿学来的那一套？”我的母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胶东“肃托”冤案中，曾被当成托洛茨基派，捆着两个大拇指，吊在梁上刑讯逼供；我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被一群革命造反派关起来围着痛打……那也许是“党性”，但肯定不是人性。人在那个环境下都是工具，是一个机器上的部件，在一个统一框架中，你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由你具体的位置决定的。否则只有退出，而常常退出就意味着丧失一切。

全国都在学习六厂二校的经验，我们那个地区也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宽严大会”。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安排好了的。在一片开阔地上搭起了主席台，四周红旗飘舞，标语满目，电线杆上几组大喇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激昂的口号响彻云霄，支左部队首长、地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就坐主席台，成千上万的百姓集体来到会场。会场两边还搭起了为主动坦白交代人用的临时棚子。大会开始后，就是宣布政策，声色俱厉，告诉所有的人，你们的情况我们都掌握，给你们最后的机会，主动坦白可以宽大处理，继续顽抗，严惩不殆。这就是当时掌握生杀大权的司法程序。有人陆续走上台交代历史问题、经济问题、盗窃和思想作风问题之类，其实都是陈糠，这些人被当场宣布从轻处理，或是无罪解放时，感激涕零。大喇叭还在高声吼叫最后一次机会。这时有人上台揭发一个历史反革命又有现行活动者，主持人宣布把这个人揪出来，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民兵从人群中把这个还在惊愕之中的人押着，拎上台。于是宣布他的罪状，罪大恶极，又负隅顽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场宣布死刑，马上押上大卡车，拉走执行了。实际上他是一个历史上定过案，属可杀可不杀之列，但这次大会必须要杀一个人，他就只好倒霉了。杀人所激起的狂热和恐惧，使宽严大会的革命气氛如原始宗教般地达到顶点。这其实是一场胜利者对早已注定了的失败者的战斗，猫鼠之戏。

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中亢，有人报告“那边出事了，快去看看”。我随着众人到村边，只见老百姓围了一个半月形。不远处光秃秃的黄土地里，一个小坟头，坟旁一棵老树，就像北宋画上的那种，树上吊着一个人，有人告诉我是一个村里的老地主。此人平时低调，我甚至没怎么见过他。以前多次运动不知他是怎么过来的，这次真的过不去了，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自己把绳子挂在树上和脖子上，顺着坟头一出溜，一切痛苦都结束了。华北大平原，一条简洁的地平线，那人本来瘦高，现在孤零零挂在那儿，天地之间，显得分外高大。我壮着胆儿走过去，他穿着一身干净的黑衣服，新鞋，绑腿打得整齐规矩，吊死的人样子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只是静得瘆人。苍白而略显青灰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平静得有些肃穆，跟这个世界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

我怎么会突然间想起父亲的朋友老舍和傅雷？

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大大地触动了我的的人生观。在一次偶然的闲聊中，得知此乡还有十几个叛徒！很出乎意料，因为我脑子里关于叛徒的定义是共产党内部的变节投敌者，而且常常是有一定级别的，这种穷乡僻壤出的什么叛徒？还那么多。经了解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只是因为当了俘虏。当时孤军深入一路打到南朝鲜，美国指挥的联合

国军在仁川登陆，拦腰切断，俘虏了志愿军两万多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他们无法回答，军人在战场上为什么要投降？为什么不死？死了是英雄，投降就是叛徒。可是没有人问，胜败是兵家常事，打了败仗，难道是士兵的责任吗？很久以后才知道，停战之后交换战俘，两万多志愿军战俘，面临回祖国大陆还是去台湾自由中国的选择，一万二千人去了台湾，其中不少在四、五十年之后腰缠万贯，衣锦还乡；那八千回到祖国的战士，就统统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或是关进监狱，很多就死在那里，听说是当时东北局主席高岗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的决定。

能够回到原籍村里的，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有熟悉的乡亲知道这人是怎么回事儿。我跟一个前“最可爱的人”聊过，他曾经是，现在仍是，一个淳朴的农民。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志愿军瓦楞棉袄，戴着志愿军的旧棉帽，帽耳朵搭在两边，随着脚步上下颤悠，两根系帽绳儿一摆一晃。他扛着锄头远去，勉强尴尬的苦笑里透着卑微和心灰意冷，“赖活着吧。”他说。

稍后的1972年，越战结束，一件事使我再次震动，那时中国和美国已经改善了关系，部队传达越战结束文件。其中有关于交换战俘的描述。第一批美国兵战俘回到美国的时候，尼克松跟他们发表了一个电话讲话，大意是说欢迎你们回家，你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今天不见你们了，先好好休息，跟家人团聚，过些天我再见你们。就是这几句话，我又想起了村里的那些叛徒，瓦楞棉袄，颤悠着的帽耳朵，和扛着锄头远去的背影。

很快，我又接受新的安排，离开了支农的村庄。

### 三

有关我们部队的各种消息不断见诸各种大小报刊，这里自然有我一份功劳，我先是被任命为二连报道员，很快在营报道组当了副组长，不久又升任组长，这是当时在我军很有些名气的“一五三七部队红松报道组”，先进报道组。不光是写稿，有一次我出外采访，正赶上大雨之后，山洪暴发，冲断了高碑店到易县之间的小铁路，淹了村庄，我当即加入救人抢险修路的人群，并写成稿子，连夜送到保定报社，编辑们都为之动容。这下我的文章连同我的事迹一块儿上了报。入党的那天夜里，我趴在被窝里写了一首长诗，热血澎湃地从中共党的历史、父辈和先烈，写到自己的成长，到展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可惜那首诗找不到了，以后也永远写不出那样的诗了。

因为当时部队尚兼顾着支农和备战两方面的任务，为工作方便，我们报道组被安顿在易县城西关附近，县供销社的几间房子里，多少游离于控制之外，不必天天出操，可以专心看书学习，好几部马列主义的大部头，和相当数量从被查封了的县图书馆搬回来的中外名著，也都是这个期间读得。写稿间隙，便去漫步易水河，凭吊荆轲塔。日子过得如同军中贵族一般。

有人告诉我，部队首长很器重我，说这小子行啊，去一趟北京，上一篇军报。军中最看重的是解放军报，远超过人民日报甚至红旗杂志。

其实，这时北京对我的吸引力已经不仅仅是回家看望父母。我在北京有一群天才的哥们儿，我尊他们为兄长，现代诗的先驱郭路生，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全才徐庆东，能高瞻远瞩的章百家，才华横溢的刘会远，民间钢琴家黄元，还有师大一位渊博的学究张梦阳，等等。我们研讨的范围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电影、戏剧，几乎无所不包。实话说，我真正的艺术启蒙，应该是这段时间。

回北京另一个迷人之所，是能见到我的女友。

她是父亲一个老朋友的女儿，原来一个聪明的小姑娘，这时已是清纯少女了。她的父亲当时在职，在政治边缘走钢丝，我父亲通过关系把她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弄回北京，住在我家，藏着，我一回北京就能见面。她爸认识66军的军长，一段时间后她去那儿当了兵，我以哥哥的名义去杨柳青看望过她，后来北京军区的大型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她被抽调为解说员，离我家近在咫尺。我们曾一起度过多少醉人的时光，谈理想，谈事业，她聪明，我请教，她字写得好，我也使劲练，我会唱歌，她爱听，我会背诗，她也爱听，我会讲故事，有一次给她讲焦裕禄，她听得泪流满面。一个每次必去的地方，是东安市场吃奶油炸糕，还经常光顾崇文门新侨饭店的西餐厅，服务员都诧异：这两个小当兵的点菜还挺内行。不见面的时候，信几乎一天一封，我常常到县邮局从分拣箱里直接把信拿走。那时我们是“亲密无间”了，可那时候是多么单纯，又傻又单纯，什么都做了，唯独没有上过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我更爱她。

1971年的春天，也就是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布拉格的时候，部队首长跟我谈了话，准备提我到机枪连当排长，就是说，军装要换四个兜儿，冲锋枪要换手枪了。

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一切都似乎理得顺畅，我如同站在高山上，沐日临风。但这时我受到迎头痛击。我没能去机枪连上任。提干的命令下了，但是又收回了。营长教导员见了我都露出惋惜和无奈的眼神。有人告诉我，一份材料从北京市公安局转到我们团，说这个人在文革初期反对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在那个年月，这几乎是杀头之罪。团政委在材料上批示，要深挖细找。其实我一直很敬佩我们团的王政委，外号“铁嘴”，有政治水平，给全团训话，两三个小时，一二三四，条理分明，不仅没有一句重复的废话，连一个嗯啊的语病都没有，阔论滔滔如江河直下。我心说，王政委怎么这么无情！不知他是真的不明白中央文革和江青是怎么回事，还是面临这种风口浪尖的问题要做出无奈的抉择？至少他的资格太浅，对我父亲这一代老首长没有感情，我爸当政委的时候他还没当兵呢！无论如何，我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团保卫股传我谈话，保卫股大概就是战争年代的“锄奸科”吧？他们跟我说这次只是了解情况，不要紧张，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一饮而尽。谈话很理性，我很快镇定下来。我知道一定是以前的朋友中，有谁出事儿被抓，把我供出来。我的确说过不少反对江青和不满中央文革的话，也秘密张贴过大字报和散发过小字报，如今只能咬牙一概否认。就像当年北京三中的群众专政办公室传我谈话的时候一样，我反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江青呢？样板戏的原作是谁写的？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合情合理的争辩。其实我心里很忐忑，他们完全不知道，当时江青正要把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地名、人名全部改掉，把故事彻底据为己有。保卫股并没有穷追不舍，谈话就只有这一次，便搁置起来。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外调，还是多年后重会一些老友时才知道的。

反复考虑后，我给女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时她已经回部队了，军博的展览早已结束，她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一直送她到天津。

回信比我盼望的晚很多，话说的也比我期望的冷静很多。那种微妙的改变瞒不过挚爱的人的敏锐。但我还是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接二连三地写信，一如既往地谈理想和事业，读书的心得，思考的体会，和对她的挂念……回信的间隔越来越长，信写得越来越短，终于音信全无。

双重的打击很沉重，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落下了头疼的毛病。有一次跟我妈说：“反正我手里有枪和子弹，逼到不行了就同归于尽吧。”军队里的恶性事件并

不罕见，把人逼到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做出极端行为很容易。

张子明是个先于我从河南许昌参军的农家孩子。他天资聪颖，又好学博览，看问题深刻敏锐，为人正直质朴，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才子。我参军后很快和他成了好友。我当报道员是他力主推荐，他当时是报道组的副组长，他当了组长时我是副组长，他提干到团里当干事，我就是报道组的组长。我们无话不谈，除了西方文学艺术之外，我们可以就任何问题深入探讨。有时我们一起去北京送稿子，一起住在我家。我父亲极爱跟他聊天，非常器重他，他是我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

张子明的一个老乡挚交，在团里当书记，管档案。那时的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份档案，你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有什么东西，但是那个神秘的卷宗维系着你的政治生命。子明很为我的事焦虑不平。一天悄悄问我：“你想不想看看你的档案，我可以想法弄出来。”我们都知道这是违反党纪军法的。

我们是在一个相当隐秘的地方，假装朋友坐着聊天，看了我的全部档案，心里轻松了一大块。里面绝大部分的记录，都是我如何治病救人，如何舍己为公，尽是好事，北京市局转来的材料没什么了不起，有关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言论也都没有任何超出我估计的指控，倒觉八分坦然了。

这个举动的秘密，我保守了几十年，我和张子明的友谊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再向女友解释，我知道此时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有时我独自漫步易水河边，易水这时已经算不上一条河，只有无数巨大的和不太大的卵石布满宽阔的河道，河水如溪流般在卵石间蜿蜒流淌。战国末年，强大的秦国灭了赵国，燕国危在旦夕，于是燕王策划了刺杀秦王大计。义士荆轲带上樊於期的头，在这儿与流亡的赵王和燕太子丹高歌壮别。我坐在河床中的一个巨石上，看着河岸，两千多年尽在眼前，想着辛弃疾的词句，“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满座衣冠似雪！几个字，勾画出悲怆的历史。

有时我独自走上荆轲山，坐在残断的石碑上，辨认那些模糊的铭文，远眺紫色的狼牙山，嶙峋狰狞衬着桔红的天空，残阳空照着燕赵古国。这时我在想，为什么荆轲注定是一个悲剧英雄？那是因为秦国的大势已成，从穆公任用百里奚，到孝公任用商鞅，至嬴政用李斯时，已经空前强大，六国早已病入膏肓，即便杀了一个秦王，还会有新的秦王，依然要灭掉六国。又想到谭嗣同，为什么也注定是悲剧英雄，只能抛头颅洒热血为后人开道？因为天下大势未成，时候未到。天时难违。

所以认清历史，明瞭时代，方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我现在生活的到底是个什么时代呢？从小受的教育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他们都是悲剧英雄，都是革命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但是对他们的个人来说，是全部的生命，只有一次。

在和平年代，人生的价值究竟应该如何体现？

1971年的夏天，基辛格突然访问了中国，并且发表联合公告，中国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部队在集体收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的时候，我敢说从首长到士兵，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儿，这简直是比天方夜谭还要神奇的故事。我的兴趣一下子就转到国际，搜集研究能找到的各种材料，开始意识到中国之外的世界。

初秋，风云突变。我们接到紧急动员令，全副武装待命。水壶灌满了水，米袋装满了米，领的子弹和手榴弹都是真的。甚至还发了构筑工事的小铁锹和镐。不知什么事，真的要打仗了吗？军车浩浩荡荡在漆黑的夜里疾驰，到达新的驻地时天已经亮了。我觉得眼前的景致好生熟悉。少年时训练，从北京骑自行车到八

八达岭，总要经过这片地方。很快确定了我的判断，这儿是北京的北部咽喉，在八达岭和城区之间，昌平区境内，新的防区驻地叫后白虎涧。

我们这是又回到北京了。

一天一天，日子在一级战备的状态下过去。忽然悄悄传来让人不能相信的小道消息，林彪政变失败，驾机逃往苏联！这荒诞得如同太阳西升东落。我们号称是林彪的嫡系部队，林彪是父亲的老上级，党章写明的接班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天才的军事家和我们最崇拜的副统帅。但是并没有人出来辟谣。

终于正式文件传达下来，一切属实，而且林彪已经在蒙古沙漠上机毁人亡。一代英豪折戟沉沙。

我一连几夜难以成寐。百思不得其解而求其解，这才开始把以往熟悉的、奉为经典的东西，以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审视。

十月，中国重入联合国。乔冠华在第一次大会上跟苏联代表死掐。

十二月，苏联在火星着陆。

一月，中国氢弹爆炸成功。

二月，尼克松到访，与周恩来的风采轰动了世界。

接下去，还有马王堆的古尸，慕尼黑奥运会的凶杀，田中角荣访华，世界上的国家，突然几乎一天一个地跟中国建交……

目不暇接。像是门忽然开了，窗户也忽然开了，我睁开眼睛，醒了，看见了知之甚少的世界，浑身躁动，心比天高。运动，批判，整人，挨整，写作，上报，审查，检讨，这一切一下子统统变得虚假，中国需要的不是这些，我要做的也不是这些。此时感到，仕途已不再重要，我要离开军队，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驰骋，去奉献，中国要科学，要工业，要农业，要文化，要赶上世界。我进城的时候，去外文书店买了《英语900句》和英汉双解杜敦词典，带回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晚上可以收到何丽达女士“在华盛顿主持播讲的英语九百句”节目，另外，还从家里带回一套围棋。

想通了，心定了，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觉得天又蓝又大。能超越个人的得失恩怨去思考的时候，有一种很得意的解脱和崇高的满足感。

对我的政治审查拖了将近两年，结束简单得近乎荒诞。

一天范叔叔到我家看望父亲，他也是当年在东北缴匪时父亲的部下。我爸那天对我的事迟迟不予解决很恼火。范叔叔说，政委你别着急，我去一趟。范叔叔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高碑店，到了师部，见到师政委就问：“老政委的儿子在你们这儿，你就不管啊？”师政委问：“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哇！”范叔叔道清缘由，师政委把保卫科长叫来，让他问问我们团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如果有，把材料调到师里来，团里就不要管了。我的档案材料当天就送到师里，保卫科长拿着材料问政委怎么处理，“烧了！”

就这么一句话，事情全部了结。

1973年的春天，我写完了最后一篇文稿，最后一次精心擦拭我的冲锋枪，把领章、帽徽摘下来，交还了军大衣，把要带回家的被子、褥子和几件旧军装，打好背包，把71块钱复员费放在兜里，坐火车回到北京。

出了北京火车站长长的地下通道，坐上103路电车。沿途经过王府井、北海、西四、阜外大街，一直到甘家口商场。一切一如既往，自行车浩浩荡荡，北京人忙忙碌碌，公交车熙熙攘攘。

一路默默看着。

北京，我又回来了。

## 罗伯-格里耶的文学态度

陈力川

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 2008 年去世的时候，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个消息，心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一晃五年过去了。有时一个微小的愿望也需要长时间的孕育才能实现，像一粒种子需要时间发芽。五年来我重读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和文论，他已不再是 1984 年我在北大读研时见过的那个陌生作家，而是一个历经沧桑故去的友人，他的故事要从放弃植物学研究而从事文学写作讲起。

“我开始写作，可能与大家一样，是出于政治和性的原因。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知道一切都与性有关，自马克思以来，我们知道一切都与政治有关。我大致是在二战结束后在对自己和世界的双重发现中开始写作的。政治发现是指我出身于一个右翼家庭，作为右翼家庭的子弟，我相信秩序。如同对所有的右翼家庭一样，与人民阵线<sup>2</sup>相比，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秩序。……后来与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我发现纳粹主义<sup>3</sup>是一个疯狂的、血腥的制度。然而，我曾在战时的德国看到笑容满面的金发儿童和帮助老太太过马路的士兵，我曾看到一切是那么井然有序。突然间，我看到了秩序的另一面，即隐蔽的混乱。……于是，我发现了纳粹主义隐藏的另一面是疯狂的罪行、恐怖和梦魇。种族灭绝的想法完全有悖理性，是疯子的想法。正是这一发现促使我写作，我写的就是秩序与无秩序的斗争。……此外，长久以来，我感到我不是一个‘正常人’，我发现施虐淫和受虐淫的画面对我的性器官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我将这一发现写进了我的书。”<sup>4</sup>

“秩序和无秩序是不断威胁世界的两种危险。”

——保罗·瓦雷里

“我写的就是秩序与无秩序的斗争。”带着作者提供的这把钥匙，我重读罗伯-格里耶的《嫉妒》（1957）。在这部小说中，秩序与无秩序好似透过百叶窗照射在地上的光线明暗交织，人物的动作和故事的情节有规律地重复，像电影里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场景在不同的时间反复出现。事件在同样的地点发生，但随着故事的进展而变化，就像西班牙宗教仪式队伍一样，沿着不同的路线经过同样的地方。叙事者想方设法建立秩序，理顺思路，但是无秩序始终占上风，思路越理越乱，甚至搞不清楚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什么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叙述没有前后连贯的时序。小说的结尾，读者始终不知道在女主人公阿 X 和她的邻居弗兰克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事，而一切又都是可能的。表面上看去，一切都是那么可疑，但是细想起来又觉得一切都合情合理，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叙述者思前想后，只有疑虑顽固地盘踞在心头，挥之不

<sup>2</sup> 人民阵线 (Front populaire) 是 1936—1938 年间在法国执政的左派政党联盟，由三个主要政党组成：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激进社会党和共产党。

<sup>3</sup> 纳粹主义是德语 Nationalsozialismus (国家社会主义) 的缩写。

<sup>4</sup> Entretien avec Jacques Henric, *Art Press*, repris dans *Le Voyageur*, pp. 445-446.

去：“最令人不解的是，类似的情况以前居然从来没有出现过。”<sup>5</sup> “以前即便有过类似的情况，却从来没有这样安排过。”<sup>6</sup>

《嫉妒》的叙事陷入了一个现象和幻觉交叉的迷宫，阅读不能沿着一个方向进行，而是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延伸。例如阿 X 与弗兰克进城的那一段，两人刚刚还在商量何时动身，何时赶到城里，话题一下子转到对一本小说的评论，紧接着又谈到他们从城里回来的路上，车抛锚了，马达不转了，天黑了，所有的修车行都关门了，不得不在一家蹩脚的旅馆里过夜……叙事者承认弗兰克的话“说得很得体，完全合乎逻辑。这种叙述的方式前后一致，很有分寸，越来越像法院上的那种证词或交代”<sup>7</sup>。只是与弗兰克有意不忽略每一个细节相比，叙事者的妻子阿 X 却好像对这件事讳莫如深。

《嫉妒》不仅是一部视觉小说，也是一部听觉小说。读者一边跟随叙述者的视角在看，一边借助他的耳朵在听。有时看到听不到，有时听到看不到。如果说《嫉妒》的叙述仿佛是一架摄影机，那它不仅在录像，同时也在录音，但与电影不同的是，观众看到和听到的并不一致，眼睛和耳朵构成了两个矛盾的叙事中心，将读者同时导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例如：

“在暮色苍茫中，那一带很快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她好像在侧耳倾听四面八方无数昆虫所发出的叫声。”<sup>8</sup>

“四只手平行地并排摆着，一动也不动。阿 X 的左手与弗兰克的右手之间，只有大约十公分的空间。从山谷深处说不清多远的地方传来一只夜行猛兽尖厉短促的叫声。”<sup>9</sup>

“但是，她离开车子时浑身上下并无任何变化，而那辆蓝色大轿车的马达却在继续运转，使院子里充满越来越大的轰响。”<sup>10</sup>

凡是读过凯特琳娜·罗伯-格里耶的日记《新娘，1957-1962》的人都知道她丈夫施虐淫兼受虐淫的性倾向，还有在想象中窥视他人隐私的毛病。罗伯-格里耶说他将这一发现写进了他的小说，《嫉妒》的叙事者的身上就有作者的影子。这个叙事者好像一个只窥视和倾听的旁观者，一个不露声色的隐身人。叙事角度是第一人称，但从不使用“我”字。他好像在场，又好像不在场。说他在场吧，他从不参与谈话，也不回答问题；说他不在场吧，露台上给他摆好的第三把椅子，餐桌上有为他准备的第三套餐具，女主人每次斟酒或调配饮料，总有他的一份。仆人会对他：“太太没回来。”他好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种植园主，整天窥视妻子和邻居的一举一动，猜测或假设其中的含义，又得不到确切的解释。第三者好像不是他的邻居弗兰克，而是他自己。他并不用语言和动作表达任何嫉妒的情感，但读者能感到他满腹狐疑。怀疑是最难打消的情绪，它不仅折磨自己，而且使被怀疑的人一下子失去了清白。其实清白只是一种不受怀疑的状态，一旦成为怀疑的对象，一切都变得暧昧起来：

她的“白色裙衫的上身齐腰消失了。头、胳膊，以及躯干的上部都塞到车窗里，同时也就使人无法看清车内发生的事情”。<sup>11</sup>

<sup>5</sup> 阿兰·罗伯-格里耶，《嫉妒》，李清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sup>6</sup> 同上，第104页。

<sup>7</sup> 同上，第52页。

<sup>8</sup> 同上，第16页。

<sup>9</sup> 同上，第23页。

<sup>10</sup> 同上，第46页。

<sup>11</sup> 同上，第67页。

“到了汽车机器罩的前边，两个人又很快聚拢到一起。弗兰克的身影比较大，从一点上望去，他完全遮住了后边的阿 X。弗兰克的头朝前稍低着。”<sup>12</sup>

类似的暗示性语言好像在问读者：你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儿暧昧？你是否也有过相同的感受？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嫉妒》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是一种类似嫉妒的情绪，情节是这种情绪从产生到蔓延的过程。罗伯-格里耶的这部小说没有落入写三角关系——丈夫、妻子和情人——的俗套。

**“有创造的需要是因为我感知的多，理解的少。”**

**——斯宾诺莎**

在罗伯-格里耶看来，世界有两种真实，一种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另一种是心灵世界的真实，艺术是在这两种真实的冲突中诞生的。如果一个艺术家完全认同外在世界的真实，那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创造什么。创造的冲动来自一种内在的矛盾：我们看到和感知的多，理解和明白的少。作家的工作是创造一个与外在世界既平行又交织的心灵世界，并将这个世界作为另一种真实呈现出来。换言之，促使小说家写作的有两种动力：一是小说家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他把他知道的解释给读者听，不仅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高谈阔论；二是小说家承认自己搞不懂这个世界，他叙述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不解和困惑。新小说派作家的写作就是为了揭示世界的不可知性：世界并非渗透了意义，荒诞不经和莫名其妙很可能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巴尔扎克是第一类小说家的代表，对于他们，世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一切都是不难理解的。世界的可知性加小说家的表达力等于真理的言说：叙事者对他的人物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无所不知：“路易·朗贝尔于一七九七年出生在旺多姆的一个小城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家不起眼的制革厂，并打算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然而他很早在学习表现出来的天赋改变了父亲的主意。”<sup>13</sup> 读者可以为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写出一份清楚的履历。

罗伯-格里耶将 18 世纪的英国作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和法国作家狄德罗视为第二类小说家的先驱，因为他们颠覆了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关系，就像狄德罗在《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人物出场时说的那样：“他们是怎么碰见的？萍水相逢，和大家一样。他们叫什么名字？这关您什么事？他们是从哪来的？从最近的地方。他们到哪儿去？难道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哪儿吗？”叙述者好像一个旁观者，与读者一样对他的人物一无所知，人物只是在大街上偶遇的陌生人。是狄德罗和斯特恩首先提出了谁在叙述，怎么叙述，以什么名义叙述的问题。

《局外人》的作者加缪可是说是第二类小说家的代表，叙事者不是真理的代言人，而是小说中的一个普通人物，他不掩饰自己的无知和局限性：“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这个懵懵懂懂的人物的口头禅是：“我不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呢？”

罗伯-格里耶认为，在现实中“真正的故事更像新小说，而不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弄虚作假的现实，一种使人放心的东西……”

<sup>12</sup> 同上，第 110 页

<sup>13</sup> Balzac, *Louis Lambert*,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1951, p. 1.

<sup>14</sup> 在萨特的小说《恶心》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次主人公洛根丁感到恶心难耐，他不去药店买药，而是去图书馆借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来看。还有一次在饭店，洛根丁看到一个杯子，恶心感重新泛起，他赶紧从书包里拿出《欧也妮·葛朗台》抄写了两页，恶心感随之消失。洛根丁显然将巴尔扎克的这部小说当做能治病的良药，因为《欧也妮·葛朗台》描写的是一个确实可靠的世界，不似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靠不住的。《欧也妮·葛朗台》使他重新找到了他习惯的生活坐标和安全感。

“超现实主义是相反的事物停止对立的地方。”

——安德烈·布列东

在罗伯-格里耶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充满了空白和矛盾，一个协调一致的世界是可疑的。苏格拉底以前的古希腊哲学将矛盾的因素看做世界生成的必要条件。黑格尔说矛盾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人类精神的演变是一系列矛盾的结果，而且矛盾是不可消除的，只能超越，也就是上升到另一个层次。在《嫉妒》中，女主人公和邻居弗兰克谈论一本小说，故事讲的是非洲殖民地的生活。罗伯-格里耶用小说套小说的方法将矛盾理论推向极端：

“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名海关官员。人物不是官员，而是一家老牌公司的高级职员。那家公司从事一种肮脏的交易，很快就发展成为诈骗行为。那家公司从事着一种十分高尚的事业。据悉，主要人物不老实。他是个老实人，企图从前任造成的残局中重振企业。前任是在一次车祸中受伤身亡的。但是他根本没有什么前任，因为那家公司是新近才成立的；而且也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车祸。再说书中讲述的是关于一艘船（一艘很大的白轮船）的事，而根本没提什么汽车。”<sup>15</sup> 这段话前后矛盾，前一句肯定，后一句否定。罗伯-格里耶通过小说中的小说把作家编故事的各种可能性展示出来。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之所以永远处在变化之中是因为它有漏洞。正因为有漏洞，科学才会不断进步。卡尔·波普尔说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它们自以为博大精深到什么都能解释，关闭了所有开向未知的门。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个严密的体系通常是不完整的，否则它就会失去其严密性，因为严密性包含空白。罗伯-格里耶是带着这种科学观念介入文学写作的，所以听到文学批评家指责他说“巴尔扎克不是这么写的”，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没有人能对一个科学家说“你不能建立这个理论，因为牛顿不是这么说的”。

罗伯-格里耶说他在写《窥视者》的时候并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多年后当他读《群魔》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这两部小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小女孩被强奸后遭杀害的情节作为叙事的中心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罗伯-格里耶奇怪二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位批评家指出过这一点。《窥视者》简直就是《群魔》的改写。实际上作家略去不写的情节正是全部叙事围绕的中心。

这个“隐而不言”的空白使一个本来连贯的叙事产生了断裂。在《窥视者》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就有一段时间和空间上的空白。这与叙事者一贯精准的描述和细心的记录形成极大的反差。读者发现最重要的情节可能不是叙事者交代的那些事情，而恰恰是叙事者没有交代，而又绕不去的一件事：在这个被漏掉的时

<sup>14</sup> Alain Robbe-Grillet, *Préface à une vie d'écrivain*,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2005, pp. 92-93.

<sup>15</sup> 阿兰·罗伯-格里耶，《嫉妒》，李清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间之内，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可能被强奸、焚尸并被扔下悬崖。读者根据某些线索明显感到叙事者（旅行推销员）很可能就是在这段空白的时间内强奸和杀害那个小女孩的凶手。叙述者一会儿压缩，一会儿拉长上午发生的事件，好像有意抹去犯罪的时间，为开脱自己的罪责找到借口。例如，叙事者为了不引起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让·罗宾的怀疑，主动对他谈起他登岛一整天的经历。可是这些辩解连他自己也不信服，“他问自己一小时以来和一小时以前他做过些什么，比如在渔民的小屋里……沿着悬崖……在村里的酒店里……”<sup>16</sup>；他问自己“他在大灯塔和市镇之间的路上做过些什么呢？后来在市镇里呢？再早一些时候呢？”<sup>17</sup>回忆是不是为了填补空白？有一个细节再三引起读者的疑惑，“他伸手到他的短袄口袋里去找小绳子，没有找到，他才记起……他记起小绳子已经不在他身上了。”<sup>18</sup>“在他的短袄口袋里，今天早上才捡到的那股精美的小绳子，现在也没有了。他的右手在衣袋里只摸到一盒香烟和一小袋糖果。”<sup>19</sup>那么这个小绳子到哪里去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在他的口袋里了？是不是在那段空白的时间内用这股小绳子干过什么事？

最糟糕的是，他“想起他曾经把三根香烟头遗留在悬崖的草地上，在两公里转弯角下面”<sup>20</sup>。他的那三根香烟只吸了一半，很可能被那些寻找小牧羊女的人们捡了去。在神情恍惚之中，“他看见那个小牧羊女躺在他的脚下，身子向两边扭动，进行微弱的挣扎。他把她的衬衣卷成一团塞进她的嘴里，使她不能叫喊。”<sup>21</sup>

奇怪的是少女雅克莲被害后，岛上竟无人报警。女孩遇害两天后就下葬了，也不见警察来调查。更奇怪的是有人怀疑凶手是自己的亲人，妻子怀疑丈夫因与这个少女勾搭而行凶，父亲怀疑自己的儿子与这个女孩乱搞而作案，而旅行推销员千方百计地设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是想来想去，“时间表上还存在着一个漏洞”，总是多出来一段“不正常的、可疑的、无法解释的时间”。

最奇怪的是那个叫于连的年青人，他好像目睹马弟雅思（旅行推销员的名字）干了什么事情。无论在农舍还是在悬崖那里，他都显出超常的冷静和支配马弟雅思的能力：既可以轻易替他销毁罪证（作案时扔掉的糖果纸和烟头），也可以轻易找到指控他的罪证（重新拾起小雅克莲的毛线衣扔到海里），可是最终并未告发他。

《窥视者》的前半部分事无巨细地记录旅行推销员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细到无聊，甚至令人生厌的地步。后半部分几乎是从不同的时间段回到前半部分叙述漏掉的一小时。在空间上，主人公也是几次回到案发地点，好像试图销毁证据。于是这个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空白成了小说的关键，可是主人公愈想抹掉这一空白，它在读者头脑里占据的位置就愈重要，结果叙事不仅没能填补这个空白，反而逐渐被这个由小变大的空白吞噬。

**“‘自由’与‘真理’相对立，也就是说，真理是自由的敌人。”**

<sup>16</sup> 阿兰·罗伯-格里耶，《窥视者》，郑永慧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sup>17</sup> 同上，第116页。

<sup>18</sup> 同上，第130页。

<sup>19</sup> 同上，第133页。

<sup>20</sup> 同上，第144—145页。

<sup>21</sup> 同上，第145页。

罗伯-格里耶有一个绰号叫“新小说派的教皇”。其实“新小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派别，而是一个由于夜出版社推出的作家群体。罗伯-格里耶自1956年起担任这家出版社社长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的文学顾问，直到1986年。三十年间，子夜出版社出版了大部分“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其中有莱蒙·科诺（Raymond Queneau），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纳塔丽·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罗伯特·班热（Robert Pinget），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克洛德·奥列（Claude Ollier），当然还有罗伯-格里耶本人。罗伯-格里耶也将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归入新小说派，但她本人坚决反对被划入任何一个派别。这些作家的风格不同，但都尝试脱离传统叙事方法，另辟蹊径。从这个作家团体中产生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缪尔·贝克特（1969）和克洛德·西蒙（1985）。然而这个松散的作家团体从来没有集体参与和认同过一个文学运动，最多不过是志同道合。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文学艺术的繁荣期，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方受到的摧毁不无关系，整个西方的思想界也如同被战火毁灭的城市一样满目疮痍，一切都有待于重建。面对废墟，人们的心里翻滚着一种创造新世界的骚动。新小说、新批评、绘画上的新现实主义就是在50、60年代勃发的文学艺术运动。

罗伯-格里耶正是在这个时期放弃植物学研究转而从事文学写作的。对于一个搞科学的人来说，科学有待发明创造是很正常的。在他看来，人和世界与科学一样，都在“发展中”，都没有定型，小说家要做的就是重新创造人和世界。但发明创造不意味着脱离历史。面对出版界和评论界指责他标新立异，背离巴尔扎克的叙事传统，罗伯-格里耶尝试重新诠释文学史，证明新小说不是天外来客，而是从过去的文学蜕变而来的。与《欧也妮·葛朗台》的作者巴尔扎克相比，《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写的是新小说。福楼拜没有参加1848年的革命，他的革命是创作了《包法利夫人》，所以福楼拜也是一个革命者。他用叙述形式的革命，而不是用叙述革命故事来批判那个僵化的世界。小说的叙事方法自福楼拜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福楼拜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新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写的也是新小说。小说只能是新的，因为小说一旦完成就已经成为废墟了，就像时间使一座完美的城堡变成了废墟，后人需要重建这座城堡。在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中，世界已经定型，只需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将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说给人们听。20世纪20年代后出现了另一种文学，它展示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在卡夫卡的《城堡》（1926）、福克纳的《圣殿》（1931）和加缪的《局外人》（1942）中看到的世界。这些作家不再呈现一个完成的世界，而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勾勒一个新世界的轮廓。

1999年圣诞节期间，一场特大风暴席卷法国，罗伯-格里耶位于诺曼底的一座十七世纪古宅的园林被毁，那年罗伯-格里耶七十七岁，已经出版过十多本小说，拍过十多部电影。这个园林，他前后照料了近十年。面对被风暴摧毁的古堡园林，他觉得全部作品也在一夜之间崩塌。继悲痛而来的是一种莫以名状的创作冲动，他决定重新开始。2001年罗伯-格里耶出版了一本貌似侦探小说的作品，名字就叫《重新开始》。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的柏林，战争留下的废墟和创伤仍然随处可见。

罗伯-格里耶说，“世界永远需要重建的思想是现代精神的基石。萨特将其称为自由。倘若世界已经完成，我们就是不自由的，我们只能照原样复制世界的形式。倘若世界需要重建，我们的自由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甚至在文学以外，我们始终是一个世界的建设者。”<sup>22</sup> 这里，自由的意思是说，它既是真理的发明者，也是真理的破坏者。自由是一种不断破坏和建设的力量，文学创作正是施展这一自由的地方。

2004年3月，罗伯-格里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个保守主义的殿堂最终接纳了这位颠覆性的作家。可是罗伯-格里耶不改一贯挑衅的姿态，拒绝履行法兰西学院的传统仪式：穿戴绿色的院士服，佩剑，发表颂扬前任院士的演说。双方各不让步，直到2008年2月作家逝世。

罗伯-格里耶1953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橡皮》<sup>23</sup>的题记引用的是索福克勒斯的一句话：“时间，自己决定一切，不由你做主，它已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2013. 4. 20, 于巴黎

---

<sup>22</sup> Alain Robbe-Grillet, *Préface à une vie d' écrivain*,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2005, p. 41.

<sup>23</sup> 《橡皮》是一部侦探小说，受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影响。俄狄浦斯为了避免杀父娶母的神谕离开科林斯，结果命运使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杀父娶母的罪行。在《橡皮》中，警察瓦拉斯调查一桩实际上没有发生的谋杀案，最后自己成为这个案件的凶手。

## 于坚诗选

### 左贡镇

我曾造访此地 骄阳烁烁的下午  
街面空无一人 走廊下有睫毛般的阴影  
长得像祖母的妇人垂着双目 在藤椅中  
像一种完美的沼泽 其实我从未见过祖母  
她埋葬在父亲的出生地 那日落后依然亮着的地方  
另一位居民坐在糖果铺深处 谁家的表姐  
一只多汁的凤梨刚刚削好 但是我得走了  
命运规定只能呆几分钟 小解 将鞋带重新系紧  
可没想到我还能回来 这个梦清晰得就像一次分娩  
尘埃散去 我甚至记起那串插在旧门板锁孔上的黄铜钥匙  
记得我的右脚是如何在跑向车子的途中被崴了一下  
仿佛我曾在那小镇上被再次生下 从另一个母腹

2012. 9. 3

### 梦中树

一棵银杏树在我梦中生长  
我为它保管水井 保管雨 保管蓝天  
保管树枝和那些穿黑衫的老乌鸦  
保管着午后拖在河畔的阴影  
我是秘密的保管员 虚无的仓库  
事物的起源储存在我的梦中  
如果一所文庙要重新奠基  
我能在黎明前献出土地  
我在白日梦里为大地保管着一棵真正的树  
就像平原上的乡亲 在地窖里藏起游击队长  
为它继续四季 哦 那万物梦寐以求的故乡  
原始的时间 不必妥协的国度 它是它自己的君王  
它是它自己的光 它是它自己的至高无上  
自由舒展 光明正大 地老天荒  
那些念珠般的白果 那些回归黄金的树叶  
当秋日来临 光辉之殿照亮条条大道  
世界的伐木者永不知道

还有最后一棵树 树中之树  
在水泥浇灌的不毛之邦  
后皇嘉树 橘徕服兮  
我是它幽暗的福祉

2012. 6. 18

## 我看见了古拉格……

我终于看见了古拉格群岛  
秋天拍的镜头 在云杉树林  
海岸 修道院 盐场和劳改营的废墟上面移过  
在跑过球场的孩子们溅了泥浆的小腿上移过  
在绕开沼泽地走向庄稼的旧帽檐上移过  
在这样的天空和光线下 大地明亮而真实  
仿佛没有美 也找不到丑陋  
在这样的大地上面 天空高远 白云自由自在  
仿佛没有罪恶 也没有善  
在这样的群岛之间 大海怀着洗衣妇的喜悦  
沿着沙滩晾开它羽毛般的裙摆  
就像任何一处大海 苦咸中都藏着一个  
无法清洗 只能虚传的古拉格  
回忆录或小说里都不存在的古拉格  
长舌头索尔仁尼琴从未说出的古拉格  
我试图跟着镜头寻找那些苦役犯  
那些不叫做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匿名者  
这是徒劳的 天空下只有笑容  
只有被日光无辜地投进水洼的  
芦苇丛的忧伤 这不是俄罗斯的忧伤  
不是普宁或者莱蒙托夫的忧伤  
这种被自然流放在大地上的忧伤  
没有意义的忧伤 我体会过  
多年前 在怀里藏着一本地下流传的《复活》  
我跟着落日走向工厂后面黑暗的秋天  
我听见乌鸦在金汁河畔的柏树上叫着  
古拉格 古拉格

2012. 10. 30

灰色的威尔士

灰蒙蒙的威尔士  
熄灭在大地阴影中的威尔士  
灰指甲上戴着一座座小教堂的威尔士  
闪闪发光的威尔士 充满灰质的威尔士  
令我灵魂中灰暗的海洋汹涌起来的威尔士  
灰色的大海抓住它的尾巴努力要成为它的诗人  
灰色的雨点带来一批批灰不溜丢的诗人  
背着铅灰色行囊在天空下唱着歌迈着大步走出灰色的诗人  
闭着眼睛醉醺醺地要将红色小轿车一辆辆开回灰色的诗人  
忧郁的诗人 蹲在咖啡馆将烟卷中的灰弹到稿纸上的诗人  
愤怒地朝着大不列颠黑白分明的水泥柱子抹灰的诗人  
提着湿淋淋的雨伞永不开启的诗人  
快乐的灰姑娘和她的银灰色的诙谐诗人  
用木棍一寸寸敲打着土地取出盐巴的诗人  
迷惘的旅行者呵 在威尔士 你要在道路的尽头洒一点盐灰  
这不是海岬的灰 不是高地上绵羊的灰  
不是老鳄鱼和大海脊背上的深灰  
这不是万物的灰烬 是班戈镇的诗人格温·托马斯的灰  
一点点 泛起在旧鸭舌帽的帽沿上  
连海鸥的灰眼睛也没看出来  
这是另一种面包屑  
灰色的

2012. 10. 8, 于威尔士

## 厚土

大热天 火葬场排着队  
热闹 不亚于街面上的马龙车水  
周围摆花圈 后面挂遗像  
无论那是侏子手 暴君 李二狗  
或者邻居家的窈窕淑女  
堂而皇之 一个个躺在台上  
浓妆豔抹全描过了头 这一套要到位  
只有本人亲自动笔 自然啦  
大多数是逆来顺受的好人  
全尸 盖着棉布 一辈子没抱怨过一句  
这就令恶贯满盈者更显眼 醒目 凸出  
他们也到任啦 传说都是钢铁炼成  
没想到也要打入另册 就像五笔输入法敲出的  
仿宋体签名 都是一脸死灰 横竖撇捺点 俱全

毫无愧色 悼词 或长或短 一律文过饰非  
骷髅们一个字也听不见 送葬的心里为数  
要在现实里找出个实词可不容易 语言学爱好  
褒义词 总是站在虚构一边 实话实说 得用  
口语 骂脏话 瞧这位乡党干的好事  
背叛方言 背叛祠堂 背叛故乡  
自命在为世界赋格一只神曲 不孝  
晚餐中出去拨了个号码 密告了亲生父亲  
不忠 肝胆相照的春天 领着推土机和撬棍前来  
拆除田野 推平花园 填掉水井 砍掉他祖母的  
枣树和爱情 不义 扯谎成性 大旗总是插在  
撒旦一边 不善 传说中的魔鬼判官 唯一正确的  
校长 对一切都打×× ××××××××××  
人家只是种了一棵苹果树 人家只是在鸡蛋上面  
“放一点盐”<sup>24</sup> 又！呵 那个早晨天上挂着太阳  
他耀武扬威 倒下的都是血亲 同庚 袍泽 老乡  
俺是你叔叔啊 怎么可以下手 就因为不读圣经？  
为他祈福的师父 倒在小教堂的台阶下 笑吟吟  
呵 天使的妹妹 贝阿特丽齐 强颜欢笑 阳奉  
阴违 吞吞吐吐 秃顶的美女 一辈子怕着他  
从未贡献一个子儿的土地增值税  
他制造的是灰尘 废墟 窟窿 漏斗和沙漠  
怎么 这孽种也要推进来 与我们这些  
悬浮颗粒物一道 飘向天幕？ 秋天深了  
有点 阴沉沉的 地狱部门怎么容纳贵姓的  
吨位 老鬼但丁在太平门后面晃着钥匙 悻悻地说。  
入炉前个个都从容不迫 蒙起了脸  
一具跟着一具 都是柴 焚烧的时间也  
差不多 “耐心点吧 至少烧半个时辰”  
(管火候的交代) 悲伤都是咸的  
谁能分辨我们眼中 在为誰 流着长江？  
“看哪 那卖我之人的手 就在我的桌上”<sup>25</sup>  
只有死亡能摆平暴戾与温柔 摆平  
背叛与坚贞 神马都埋下 什么都烟消云散  
哦 忘川滚滚 逝者如斯  
伟大的厚土 永恒的土地簿  
野茫茫 天苍苍 没有作者

2012. 8. 14

<sup>24</sup> 传说，一天晚上，有个陌生人来见但丁，躬身问道“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鸡蛋。”但丁说。那人点点头走了。几年后，但丁仍然坐在广场上写诗，那个陌生人又来了，继续数年前没问的下一句话：“那么，如何烹调呢？”但丁回答：“放一点盐”。

<sup>25</sup> 见《旧约全书》。

## 核桃元首

我不属于统治阶级或某种控制系统 也不属于  
谣传中的黑势力 仅在午后 小睡 醒来  
想吃上几个秋天上市的铁核桃 钢铁集团  
赋予我强权 权柄就是这把金属钳子 超级  
市场买来核桃钳 有着与战车履带同样的  
碳素结构和锥齿 握住它 即刻拥有一只  
铁腕 寒光四射 登基 我是核桃国的小元首  
铺着花布的餐桌上 我的臣民 那一盘子圆脸  
侏儒 可以任意宰制 这权柄来自科学界 很简单  
利用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 以一具 无生命的  
V形机械 镇压并最终制服一棵大地上的树  
代代相传的坚果 小活计一桩 就是绣花的手  
也能把握 无论对手如何铁杆 如何铁石  
心肠 铁面无私 布满战壕的盾就像一位英雄  
视死如归的图腾 扼住 钳紧 用力  
咔嚓 瘪下去 碎了 开心的时刻 核桃仁  
已经和盘托出 献于王孙 可并非每一回  
都如此顺从 称心 可口 有时候它们冥顽  
不化 反抗 大逃亡 动用一个师的手指头  
和圆木撬棍 一毫克也没能塞进牙缝 全体  
遁入掩体 固守在那些幽秘的洞穴 坑道  
地下室 耳蜗 那些暗藏在核桃木家什中的  
小脑沟 愚昧的脑干和灰白质哦 我是解放者  
我是来引领你们这些黑暗之肉走向光明 成为  
伟大的碳水化合物 磷脂 蛋白质以及不饱和  
脂肪酸 纯粹的脑仁 软体 手无寸铁  
没有长着人类的舌头 但是明白地通过成果  
表态 意为：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跳楼  
自残 就是面积最大的那一块也蹦地一下  
弹开去 冰清玉洁之身 宁愿污损 自焚于  
垃圾桶 气急败坏 到手的全部背叛 宇宙  
裂开的一刻我顿感沮丧 一直以为那无用的黑暗  
囚住的只是一堆 寄存在免费仓库干等着享用的  
仁 总是有一小撮不仁 拒绝委身 反抗完美  
总是吃不到 失策的不仅是厨具生产线 也是  
我们的意志 一定有某种秘密的脑脊液在滋润着  
世界的瑞脑 哪怕钳制一只木皮核桃也会遭遇  
绝不屈服的 核 起义者的呐喊曾使志在  
必得的元首失败于独裁 一个小核桃  
在铁钳下的粉身碎骨也令方才 三点十二分

还以为胜券在握的我顿感失落 我的卑微身份  
与一呼百诺的元首不同 但是这种不顺  
对自信心的伤害以及所致的  
空虚之深 是一致的

2012. 11. 7

## 车过黄庄站

站在农人的阳台上眺望落日下的老树  
琢磨着是不是《诗经》所谓桃之夭夭  
高速列车从北面入境 扑过不设防的土地  
钢铁闪着锯子般的白光 似乎要揪出春分的肇事者  
由远而近的蚕食就像逐渐明朗的隐喻  
将意义强加给事物 依附于一只射向虚无的飞矢  
黄庄萎缩于祖先的掩体 墓碑上显考的讳被远射灯照亮  
一张拉长的纸车票 载着它的灰烬和烟 颇有裹挟万物之势  
站在大地上的那种人看不见车厢中的那种人  
他们的肉体跑得比他们的生命更快  
这个时刻 仿佛没有人类 世界回到万物中  
等待着被造物主重新分配 原野无动于衷  
一群芦苇低头让过 将彼纳入混沌  
又扑空了一站 苍茫空廓由此而来  
震耳欲聋的恐龙终于远遁 桃子们还在颤抖  
安静从黑暗里走回来找它的萤火虫  
一队野兔在夜色下面落荒而逃  
永远失去了长耳朵和钻石眼珠

2012. 7. 18

## 种植死亡

那小桉树有着铁青色皮肤和疙瘩  
仿佛也怕冷 那是少年时代  
母亲风华正茂 怀着弟弟  
战后的另一只大军刚刚出发 初冬  
旗帜在飘扬 歌声嘹亮 推土机驶向郊区  
黄昏临近 大地怀抱一种说不出的黑暗  
种下它 就是种下它的归宿 它的死亡  
但我们必须把这死亡种下 父亲说

别指望成活 儿子的成长 必须见识这一桩  
将来还要种更多 更多的死 更多的亡  
我蹒跚学步 跟着父亲 学习种植死亡的技术  
这活计很简单的 像古人那样挥舞锄头  
低下头用力挖坑 揩去汗珠 然后浇水  
埋上土 让太阳去照耀它

2012. 7. 7

## 在香港念诗

——为括号书店作

香港的水太浅 摩天大楼和小房间因此  
乘虚而入 占领了干掉的岛屿 原住鱼沉下去  
新来的金融升起 灯红酒绿中 一家书店可不好找  
兰波之鳞 藏在威灵顿街一部电梯里 高美莲的  
小书店 在粤语英语和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之间  
卖法文书 就像地下党的秘密接头点 我要执行的  
任务 太危险了 穿过中环的汹涌物流 缝隙里的  
7点半 钻进一排月台般的书架 为一群自愿出院的  
读者 念诗 此时他们已经在核对腕表 在各种帐簿和  
复写纸之间 在电脑桌前的转椅上 在烟卷烫到指头之后  
在一轮落日的假眼球对面 讨论 A 或 B 的句子太长了  
他们珍惜悬置在一个小括号里的 幕间茶歇 我得摆脱掉  
一千台自动取款机的白眼仁 我得模仿一条传说中的  
剑鱼 刺穿混凝土和玻璃门的海 在地铁站亮出乘车卡  
再磨一次 此生又薄掉一层 但诗没有 这些袖珍的韵  
已经还原 逃离了滔滔不绝 最近被李金佳和魏简翻译成  
法语 更厚了 我只揣着一份 从云南高原带过来  
在古茨店香水行和麦当劳之间披荆斩棘 差点儿被  
提大号塑料袋的游客撞倒 甩开穿黑制服的小汽车  
就像甩开带鸭舌帽的特务 步子越发矫健 突然跳下  
自动电梯 绿灯冻结 没挤进获胜者兴高采烈的队列  
但修改了第 48 行 增加了三句 拐过报刊亭 朝下坡走  
往南上天桥 避开那个正在发小广告的偷渡客 在物业的  
集中营里 开辟出一条史无前例的非法隧道 过后就  
无人问津了 后继者要重返 得再次迷路 再次  
披荆斩棘 再次 超现实 其间当了三回说谎者  
旗舰店门口 他们像明星那样问 买了没有？ 买了。  
吃了吗？ 吃了。 上哪去？ 置地广场。没好意思说出  
实情 我担心他们起疑 扣留通行证 那些短句已经  
过期 提及一次旨在落伍的飞行 鼓吹怠工 2

是今天的暗号 当它在电梯间的绿色小框里跳出来  
铁门就会打开 读诗要有光 就有了光 (书店)  
满室生辉 一群昂贵的书呆子 哑哑地望着我 正像  
战友在等候 盗窃密件归来的战友 有些紧张 我不确定  
这些将要被破译的密码 是否在转运的途中 由于周折  
不断 早已变质 白昼的营业令人疲倦 喝口水  
开始读第一首 但愿这不是一个绝望的时刻

2011. 12. 12

##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站在街道对面  
像是刚刚打了一声口哨  
召唤了出租车或者羊群  
牧人收回手插在外衣袋里  
他不能再掏出什么  
只等着被召唤者过来  
他们必须过来  
他们是出租车或者羊群  
他是波德莱尔  
就像他的诗集站在书架上召唤着读者  
封面上印着一位中年男子的肖像  
脸色苍白 神情犹豫  
黑暗的秃鹫拍翅飞去  
写诗的手不见了  
只留下面具般的脸部  
像从前某位被废黜的国王

2011. 12. 12

## 猫之光

一只猫顺着中午投向地毯的光束溜下  
遁入了波斯花纹  
我就写不下去了  
这是一束酷似猫步的光线  
有猫的轻灵和诡秘 但没有牙齿  
胡须以及所谓钻石般的绿眼仁  
一个超以象外的姿势 并没有猫

或许这束激光也只是幻觉  
我就写不下去了 琢磨着它是怎么学会的这种  
偷鱼的姿势 踮着前爪 扛着尾巴  
猫着缎子般的腰并迈出闪电才会的那种狐步  
在万物之间留下踪迹而不带一丝  
肉身

2012. 11. 30

## 饮酒行

君不见长安沉没渭水黑  
君不见玻璃大厦高齐天  
君不见可口可乐滚忘川  
君不见杜甫成笑柄  
屈原再投江

白发三千丈  
何处是彼岸  
世界啊 我厌倦了你的大合唱  
你的窟窿 你的灰尘 你的固若金汤  
今夜 提着空酒瓶飘向夏天留在高架桥下的水洼  
我要去投奔液体的神

君不见天翻地覆海水干  
故乡不可见  
只有酒依然

还是那一缸  
醉得了黄金时代的灵魂  
醉得了黑暗王国的鬼魅  
也醉得了千秋万代的过客  
不需高阳酒徒来邀我  
闻酒人即仙

上帝死了 李白  
你才是最后的监护人

一饮千秋近  
长风一万里  
载我回大唐

回到那黑暗的酒窖  
秘藏故园  
飘着五谷香

电梯间里的瘦狮子  
写字楼中的小矮人  
迷雾里的纸灯笼  
暂别满场的胁肩谄笑阳奉阴违  
回我古道热肠  
君不见光明磊落唯有杯中物  
君不见把盏临风我堂堂

期期艾艾 总算伸出了舌头  
踉踉跄跄 把你们全部吐掉

天堂不可去  
美酒在人间

大道朝东我向西  
一杯就是国王  
燃烧的肝 飞翔的胆  
沉醉的领土有一打好汉  
有一座水泊梁山

君不见醉舟已过山万重  
君不见我翻身跃马向江南  
君不见浅草才能没马蹄  
君不见乱花渐迷诗人眼  
君不见左渊明右东坡吾辈携手提壶向南山

扑掉满脸的尘埃  
对镜 我有唐朝的脸  
对月 我有李白的心

我的生命已经离座  
我在杯中庆祝复活  
朋友 我爱你们  
敌人 现在我们可以洗手  
踌躇满志的大王呵  
我要啐你一脸口水  
为最后一排的妈妈干杯!

一轮李白月  
照亮千古心

谁谓太白只独酌  
长江滚滚酒深深  
君不见葡萄美酒夜光杯  
杯中自古出真人  
君不见满街珠光宝气拜物狂  
穷途末路阮籍伤  
肥酒一杯神即还！

2012. 8. 25

